

红旗

HONGQI

中共中央办公厅
秘书局藏

一九六六年六月

2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五八年 第二期

目 录

破除迷信	范 文 澜 (1)
治水问题的两条路线	曾 希 奎 (5)
驳斥现代修正主义反动的国家论	王 稼 祥 (9)
美帝国主义在南斯拉夫的赌注	伯 达 (17)
病树前头万木春	胡 乔 木 (20)
水力和电力结合, 乡社工业遍地开花	张 桂 如 (23)
每人七分地也能成为余粮社、富裕社	田 荣 申 (27)
农具大革新, 生产大跃进	舞 道 铎 (30)
一个青年农民把柴油机改装成了拖拉机	全 云 (33)
找资源, 挖潜力, 做好农村的采购工作	杨 一 辰 (34)
五台山变成聚宝山	王 铭 三 (38)
民 为哈云上红旗飘	(37)
开渠歌	(8)
高山顶上人造江	(8)
歌 车干长江与黄河	(8)
颂抗旱	(26)



破除迷信

范文瀾

毛澤東同志告訴我們：一定要破除迷信。

現在，我們國家的每一個地方，每一個工作部門，都在大躍進。破除迷信對於躍進有很大的作用。

凡是信仰實際上並不存在的東西，或者對於某種東西的信仰並不符合它的實際情況，都是迷信。當人們着了迷的時候，把這種東西看作神聖尊嚴不可侵犯的權威，但西洋景一經戳穿，權威便成為笑柄。舉個例來看，古人說：“黿龜龍，謂之四靈”。黿龜龍誰也沒有見過，且不去說。龜是常見的。商代、周代的人硬說龜是能先知的神物，有大事疑事，總得虔誠地請它作決定。後來，社會發展了，人對自然界的認識提高了，知道龜是個蠢物，予以極大的藐視。迷信可以使蠢物變成“神物”，知識便這種“神物”還原為蠢物。可以斷言，許多迷信的對象，在科學面前，都將成為與龜同樣可笑的东西。

人類的知識，基本上不外乎生產鬥爭知識和階級鬥爭知識。通過勞動群眾在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中的實踐，通過對於這些實踐的概括，人類逐漸累積了關於自然界規律和社會生活規律的知識。隨着近代工業生產的發展，自然科學（包括技術科學）有了巨大的發展。但是在資本主義時代，資產階級學者對於階級鬥爭的科學知識卻不敢正視，並且竭力加以抹煞。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和恩格斯總結了當時人類所獲得的全部知識，建立起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從而建立起真正的社會科學。無產階級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馬克思主義所指出的社會發展規律，自覺地進行鬥爭，這就大大促進了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的發展，幫助無產階級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並將進而取得全世界範圍的勝利。

中國無產階級由於獲得了馬克思主義的武裝，就戳穿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這些曾經是不可抗拒的“神物”的西洋景，把它們投進了歷史的垃圾堆。但是在無產階級的隊伍中，也還有人對於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抱着迷信態度。必須破除這種迷信，中國的無產階級才能獲得精神上的完全解放。



这里，讓我們簡單地觀察一下中国的无产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形勢。无产階級的先鋒隊有战无不胜的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科学，資產階級企圖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以及一些破破烂烂的社会学說来对抗。事实早已証明，在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虽然无产階級还面临着許多复杂的任务，但是絕對优势是在无产階級这边，这却是无可怀疑的了。說到自然科学，情况就有些不同。这是因为无产階級首先是要集中力量去进行推翻剝削階級的革命斗争，来不及充分掌握在近代迅速发展了的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識。許多資產階級出身的或者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的知識分子，在这个方面掌握了較多的知識。但是他們往往脫离生产的实践，他們或者按照資產階級的利益去利用自然科学，或者用唯心主义的观点、形而上学的方法歪曲自然科学，从而限制了自然科学的应有的發展。取得政权的、建設着社会主义的无产階級，現在必須急起直追，充分掌握和充分利用自然科学的全部知識，掃除籠罩在自然科学上面的資產階級唯心主义观点，使自然科学在无产階級和人民的手中獲得最順利的發展。

无产階級的許多革命干部，因为长时期进行極其残酷的階級斗争，書本知識不多，本来是不足为奇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有學習的時間和条件，取得了一些書本知識，也是不足为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來，开始进行了極其伟大的建設事业。革命干部在新的工作崗位上，担負繁重的任务，很自然地感到自己的知識不足以应付客觀的需要，感到需要學習。但是，有些同志却对自己估計过低，發生自卑感。他們往往对那些讀書多年的教授學者們望而生畏，發生迷信，而不知道我們對一切都應該采取分析的态度，对教授學者也應該如此。倘有真才实学的知識分子和只有虛名的知識分子應該加以区别。同时，对于前者也應該恰如其分地加以估計，并且應該幫助他們進步。

以學者、教授、工程師为代表的中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处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大部分是愛國的。随着中国革命事业的發展和胜利，他們中間的許多人在政治思想方面經過自我改造，逐漸轉向社会主义，逐漸同无产階級和劳动群众相結合，有些已經成为馬克思主义者。他們能够用他們自己的知識和能力为社会主义服务。对伟大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他們是有貢獻的，而且今后还会作出更多的貢獻。他們拥护无产階級的領導，努力向群众學習，而无产階級也重視他們的知識和劳动。還有許多人仍在徬徨，但是大勢所趨，其中的多數迟早是要跟着无产階級和劳动群众前進的。此外，有一小部分是頑固分子。裝腔作勢、儼然充當迷信的對象，而自鳴得意的，往往就是這些頑固分子。

有些頑固的教授學者，总是堅持理論脫离实际的露說來反对馬克思主义。他們自詡為“理論家”，拒絕联系实际，似乎一联系实际便損害“理論”的尊嚴。战国时候有个赵



括，講起軍事理論來，比他的父親名將趙奢還高明，趙王着了迷，讓趙括帶兵打仗，結果六十萬趙兵全軍覆沒。不能打仗的軍事理論有什麼資格叫做理論？不能聯繫實際的科學理論還不一樣！不聯繫算是保持尊嚴，一聯繫就難免當場出丑。反對聯繫實際就是不敢正視當前革命的現實，企圖負所謂理論之隅來對抗現實。厚古薄今是一個隅，現在厚今薄古的巨浪已經沖毀了這個隅。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崇拜美國，是另一個隅。顯然，在東風壓倒西風的形勢下，這個隅也必然要被沖毀。

某些本來沒有多大本事的知識分子，自稱才大用小，不能盡其所长，因此不願拿出所長來。其實，這是市儈本色，不可輕信。這些市儈形式上可分為三種：一種是囤積居奇的。這種人有某些專長，但是自以為奇貨可居，求名求利，無有止境，售價已經遠遠超過實價，但還想得到更高的售價。其特征叫做貪。又一種是賣狗皮膏的。這種人有些貨物，不過是江湖術士的狗皮膏，却不但沒有自知之明，看了別的貨物不合狗皮膏的標準，就要指手劃腳不已。其特征叫做妄。第三種是買空賣空的。這種人雙手空空，一無所有，專憑裝模作樣，故弄玄虛，自稱是什麼家，實際只是空頭家。其特征叫做騙。“外行不能領導內行”，多半是這三種人叫喊出來的。我們不禁要問：賣狗皮膏是什麼內行？買空賣空是什麼內行？囤積居奇的，可能懂得些專業，不妨稱為這些專業的內行，但是，這只是小內行、局部的內行。無產階級的黨和人民政府領導國家全面建設，規模如此宏偉，成就如此突出，這才是大內行、全面的內行。兩種內行相比，正如一粟之比滄海。各個部門的領導，只要善於執行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善於總結人民群众的知識經驗，善於學習業務，並且使業務和政治相結合，也就是內行的領導。照那三種人的說法，等子要樂隊指揮者收起指揮棒，去拉小提琴，吹大喇叭；要將帥放棄司令部，去開機關槍，駕坦克車。多么荒謬的要求！所謂“外行不能領導內行”，本質就是資產階級頑固分子反對無產階級的領導。正因為我們各級領導在政治上是內行的領導，貪、妄、騙不得起哄抬價，妄人不得謬種流傳，南郭先生不得濫竽充數，這才急得他們亂叫起來，希望得點什麼意外的好處。我們對貪、妄、騙的把戲，有個簡易辦法，就是嗤之以鼻，予以極大的蔑視。只有這樣，迷信才能破除，而對於舊知識分子的團結、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也才得以有效地進行。

破除迷信的另一個方面，是要打破科學難學的錯誤看法。我們既要學習社會科學，也要學習自然科學。勞動者由於有實踐的經驗，無論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都是可以學好的。現在學習自然科學，更是具備着許多優越的條件。學習蘇聯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可以使我們少走一些彎路。黨和政府大力提倡自然科學，設立各級專業學校，出版大量科學書籍和刊物，為學習自然科學創造了良好條件。科學界已經開始形成相當大的隊伍，



其中有数量愈来愈大的青年科学工作者，有由革命干部转业，在实践中掌握了业务知识的科学工作者，有从旧社会来的、经过自我改造、自愿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工作者，有爱好科学、业余进行研究的科学工作者。这个队伍虽然还有待扩展，但人多力大的表现已很明显。只要肯学，到处有良师。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往往被少数人垄断，好似术士炼丹，难以捉摸；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科学为广大群众所共有，好似家常煮饭，谁都可以学会。

破除迷信的又一个方面，是要打破对书本和大师的错误看法。实践是一切科学知识的根源，实践中不断地出现新原理、新标准和新传统；书本上记载的旧原理、旧标准和旧传统，就得不断地让位给新的创造，所以书本上最新的知识不久也会变成落后的知识。归根说来，向书本学习是必要的，但不可执着，一有执着，书本便变成迷信对象，障碍事业的前进。我们应当向真知有学问而值得尊敬的科学大师学习，同时，我们还必须向群众学习。在中国古代，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等伟大发明都出于不知名的群众之手。在今天，解放了的群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更有难以数计的创造。如果科学家能够总结群众创造的经验，继续加工提高，一定可以得到许多重大的成就。反之，如果瞎得门径，一知半解，便以读过某些书本、出于某师门下妄自尊大，甘居下游，不求上进，那末，书本和大师成了迷信的对象，就只能束缚人们的思想的发展。

崇信伪科学家，把科学神秘化，把书本和大师绝对化，都是错误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应当努力破除这些迷信，不但勇敢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科学，而且勇敢地掌握自然科学。我们要掌握全人类历史上积累起来的一切有用的知识，使全部科学得到全面的发展，使一切阻碍发展的迷信观点，都在科学的照耀和群众运动的冲击下，归于消灭。

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海啸般发动起来了。六亿人民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大跃进。有些人过去对迷信的危害性认识不足，经过毛泽东同志的反复指点，警惕性也提高了。农民由于历史传统的关系，迷信本来是较多的，自从转化为集体农民以来，思想就根本改变。周扬同志在“红旗”第一期上发表的文章，引用了陕西安康县农民的一首诗：“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在迷信时代，对玉皇大帝、海龙王那样的大权威，谁敢说个不字。现在呢，大权威连影子也不见了。诗里所说的“我”，自然是集体农民的总称，也是广大群众的总称。人民一旦成了社会的主人，气魄多么雄健，风格多么崇高啊！我们要创造新生活，建立新世界，就应当有这样的气魄，这样的风格。



治水問題的两条路綫

曾希聖

在全国解放的第二年，毛澤东同志关于治淮問題指示我們：“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同时又提出“要以此为中心，爭取在几年內做出显著成績”。根据我們現在的体会，所謂“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就是說，要做得好一些；所謂“爭取在几年內做出显著成績”，就是說，要做得快一些。

当时我們在安徽工作的許多同志对于毛澤东同志这些指示的了解是模糊的，只認識到这个任务是光荣的，沒有理解到这个任务的艰巨。我們的热情很高，但办法很少，滿以为把淮堤恢复、加高培厚，把河道疏浚整理，再做几个蓄洪工程就可以解決問題。誰知在經過几年治理以后，仍然不断地發生灾害，不仅大雨成灾，而且小雨也成灾。这种情况使我們深深感到“不熟悉的东西正强迫我們去做”的困难。但我們沒有灰心。这些困难促使我們研究了“能否治好淮河”、“能否較快地治好淮河”、“能否較省地治好淮河”等問題；促使我們想办法来解决这些問題。可是，有些人在这些困难面前發生了动摇，發表了許多不正确的議論。有的認為淮河虽然能够治好，只是中央給的錢太少了，要求的时间太急了，“又要馬兒跑得快，又要馬兒不吃草”是做不到的；有的說洪水可以治好，內涝不能治好；有的則根本怀疑淮河能够治好，他們举出清、明两代治理淮河的历史来証明他們的观点；有的甚至發出怨言，認為治淮花錢太多，妨碍工业发展，說什么“治淮是上了馬下不了馬”，“治淮不知要花多少錢，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治好”。

現在，这个关于治淮方針的爭論，可以說已經基本上解决了。几年来的事实，特别是去冬今春所掀起的水利建設高潮，証明了淮河不仅能够治好，而且能够用花錢較少、收效較快的办法治好。

从工程数量看：从去年十月到今年四月，仅仅七个月的时间，全省已完成水利工程五十四亿土方，夏收前可完成六十亿土方，等于过去八年完成土方总和的四倍。其中淮北已做三十三亿土方，夏收前可完成三十九亿土方，等于淮北过去八年完成土方总和的七倍。从劳动效率看：过去淮北民工每日只做一点七方，去冬开始做三点八方，今春由于推广了改良的运土工具，在深沟取土平均也达到了十方，有的县平均高达十四方。从花



錢多少方面看，以往平均每千方土要支出三百六十四元，蓄千方水要支出二百九十元，而現在所做工程的費用，包括橋梁、涵洞、鬥門、工具、改種水稻和技工工資等各項費用，每千方土只合二元三角，僅為過去的一百五十八分之一；蓄千方水只合一元八角，僅為過去的一百六十分之一。從工程質量看，絕大部分都是符合標準的，部分較差的工程經過檢查整修後也提高了質量。特別是從工程效益方面更能看到它的好處。由於每蓄一方水，當年就能起作用，所以灌溉面積擴大二千七百萬畝，等於歷史上幾千年以來的灌溉面積總和的百分之七十九，因此全省可增產糧食四十五億斤（其中淮北為三十二億斤）；僅因改種水稻一項即可增產三十二億斤（其中淮北為十七億斤）。

根據去冬今春水利建設的經驗，我們制定了三年根治淮南北水旱災害的計劃。這個計劃要求今後在下雨量達到歷史紀錄最高點（三百九十九點六公厘）的情況下，也能免除水災。為了實現這個要求，我們還要再做幾個拦蓄上游洪水的工程，但是最主要的是在每一平方公里的面積上，至少做二十五萬土方的溝壩工程，使整個淮北變成水網地區和水稻地區。這樣，全淮北三年內共需做九十億至一百億土方。這個規劃實現後，假如十天內平均下雨四百公厘（共有水一百四十八億公方），除了由溝塘圩田的蓄水、滲透和蒸發外，需要外流的水只有三億公方，十天流出，每天平均水量只有三百五十秒公方，比過去大水年份需要外流的流量減少三十倍，這樣，淮河的容量是綽綽有餘的。假如下雨四百五十公厘，除了蓄水、滲透和蒸發外，需要外流的水也只有十六億公方，十天排出，每天只有一千八百五十秒公方，淮河也是可以負擔的。因此，在這些工程完成以後，遇到比一九五四年更大些的雨量，也能基本解除水災。而且水網工程做完以後，可以改種水稻二千七百萬畝（約等於全省現有的水稻面積），可以灌溉整個淮北的耕地，也可基本解除旱災。那時淮北的糧食產量將不是每畝五百斤，而是八百斤，以至一千斤，將和長江沿綫齊頭並進。變淮北為江南的口號將在幾年之內實現。現在淮北人民充滿信心地歌唱：“淮北平原變了樣，大地鋪上蜘蛛網，去年還是黃沙地，今年要吐稻花香，災區帽子快脫掉，換上美名魚米鄉。”

為什麼在以往幾年里，治淮速度不快，治淮的效果也不很顯著呢？最主要的，是治理淮河的兩種思想兩種方法的鬥爭沒有得到解決。在實際上，也就是多快好省的方法同少慢差費的方法的鬥爭，沒有得到解決。長時期以來，這兩種思想、兩種方法的鬥爭集中在以下六個問題上：

第一，群眾為主還是政府為主。一種思想是主張依靠群眾為主，政府支持。另一種思想則相反，具有這種思想的人不相信群眾的力量和智慧，不把治淮任務當成群眾的任務，而主張由政府包辦；甚至撤銷原來的各級治淮機構，解散各級的治淮民工組織，成



立所謂精工的工程隊，成立所謂直屬治淮機關的農田水利處。這種脫離群眾的做法，當然不可能發揮群眾的力量和積極性，不可能鼓足干劲，力爭上游。

第二，小型為主還是大型為主。一種思想是主張以小型為主，大型為輔。抱著另一種思想的人由於不相信群眾，當然也就不願搞小型工程，而且還限制小型工程。他們認為挖一口塘，開一條溝都會破壞水系，會增加水災，因而把經常性的群眾水利工程束縛起來了。他們中間的有些人盲目地想搞大型工程，認為大型工程作用大，能夠解決問題。他們不注意或者不理會這樣一個簡明的道理：小型工程是收效最快、花錢最少的工程；而且積小成大，積少成多，辦了很多的小型工程，實際上也就是辦了最大的大型工程。譬如去冬今春做了五十多億土石方的工程，就可蓄水三十多億公方，可改種水稻七百多萬畝，蓄水量和灌溉效益都大大超過歷年來所做的任何一個大型工程。

第三，蓄水為主還是泄水為主。一種思想是主張多蓄少排，而且主張在廣大地面上蓄水。抱著另一種思想的人雖然口頭上說泄蓄兼籌，實際上他們的做法是多泄少蓄，以泄水為主。他們只滿足於山谷和洼地蓄水，認為平原不可能蓄水；認為開溝挖塘、改種水稻的蓄水量不大，不同意或者不重視在平原蓄水。幾年來鄉與鄉、縣與縣、省與省之間因為泄水問題，關係鬧得不太好；今年以來，由於強調蓄水，各地區相互之間的糾紛也就大大減少了。

第四，防洪與治澇相結合的問題。一種思想是堅決主張防洪必須與治澇相結合，因為治澇不僅能夠克服年年不斷的澇、旱災害，保證丰收，而且治澇蓄水，還能夠減少洪水威脅。抱著另一種思想的人則局限於防洪保堤，認為只要大堤不破，就算完成了治淮任務；甚至認為越治澇則洪水越大，堤防越有危險。因為他們的治澇觀點是以泄水為主的。

第五，治水與改種相結合的問題。一種思想是認為治水就是為了去災增產，而增產就必須改種，改種既能利用作物的性能抗災，又能利用圩田畦田蓄水，所以堅決主張兩者結合。抱著另一種思想的人只是為治水而治水，因為他們限制群眾性的小型工程，自然不會贊成改種與治水相結合了。

第六，政治挂帥的問題。一種思想是主張政治挂帥，使政治和業務結合起來。抱著另一種思想的人片面強調業務，忽視政治，使業務脫離政治的領導。他們單純強調物質獎勵，不向群眾進行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好象治水只能依靠技術專家的領導，而無需黨的領導。

上述問題的爭論歸納起來是兩個問題：一個是以何者為主的問題；一個是要互相結合的問題。正確意見同錯誤意見爭論的目的是為了花錢少收效快，治水保收。這是治水



問題上的兩條路線的鬥爭。去年秋天以前，由於我們沒有把這個鬥爭提高到方針上和路線上來認識，所以就沒有對錯誤的意見進行徹底的批判，也就不能很好地執行毛澤東同志關於治淮的指示。

現在問題明確了，是非弄清了，方法對頭了，被壓抑着的群眾積極性充分發揮起來了。整個治淮工程大大地加快了，質量也普遍地提高了。沿淮的人民這樣地歌唱着：“過去治淮旁邊站，今年治淮當模範；過去出勤三五個，今年出勤九十三（出勤率達百分之九十以上）；過去治淮沒干劲，今年治淮像火山；過去白天當黑夜（睡大覺），今年黑夜出太陽（指燈光）；過去挖土方把方，今年挖土十來方；過去資材伸手要，今年資材自承當；過去治淮河埂上，今年治淮靠村旁；再把效益比一比，過去那有今年強。”這首民歌很清楚地說明了，在兩種不同方法下形成的兩種不同的治淮工作情景。

當然，八年來治淮工作的成績是主要的，否認這種成績是錯誤的。只有在實際工作中才能逐步地摸清治淮的具體規律，才能充分清楚地區別治淮的兩條路線，才能把毛澤東同志關於治淮工作的指示加以具體化，才能在我們的治水工作中貫徹執行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

治水問題的新經驗，不只是安徽一省的經驗，也是許多省的共同經驗。黨中央根據這些新經驗而確定下來的治水的正確路線，不只在安徽一省執行着，而且在其他各省也在執行着。可以了解，這種治水的新經驗，破壞了歷來治水的陳腐觀念，它是在我國條件下治水方法上的一個大革命。它對我國的治水工作起了偉大的促進作用，同時也對其他方面的許多工作給了很好的啓發。

開渠歌

（河南新乡民歌）

千年想，萬年盼，
雙手劈開天橋斷。
高山水利化，
旱澇都不怕。
炮聲如雷震河山，
是空劈山懸壺班，
愚公能把山來移，

我們決心修成渠，
炮聲响，彩雲升，
好象攻打上甘嶺。

高山頂上人造江

（河南林縣民歌）

炮震山谷响四方，
建設山區人人忙，
万丈深溝拦河水，
高山頂上人造江，

耳听江南好地方，
眼看我乡变苏杭。

車干長江与黃河

（貴州石阡縣民歌）

一人唱歌歌不多，
一人車水水不多，
千萬水車繞轉轉，
車干長江与黃河。



駁斥現代修正主義反動的国家論

王稼祥

人民日報“現代修正主義必須批判”一文指出，以南斯拉夫領導集團提出的綱領為代表的現代修正主義的基本內容之一，是用反動的超階級的国家論來代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国家論。

帝國主義者為了破壞革命工人運動，總是力圖隱瞞國家的階級專政的性質，把資產階級專政國家說成是什麼超階級的“全民的”“民主的”國家，而又污蔑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是什麼破壞了民主的“極權主義”的國家。在社會主義如日東升而帝國主義日薄西山這個鮮明的對照下，資本主義統治下的勞動群眾日益嚮往社會主義，帝國主義的謊言越來越不能騙人，社會民主黨的反共謠言也越來越不能幫帝國主義的忙。在這個時候，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為了報答美帝國主義者大量美元的“稿費”，便披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外衣，來販賣資產階級的超階級的国家論的私貨，以此為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效勞。

帝國主義國家的国家政權是為極少數壟斷資本服務而對大多數人民實行專政的工具。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卻極力掩蓋帝國主義國家政權的這種專政性質。他們說什麼在資本主義世界中，“國家日益監督資本”，“限制資本”，“國家調節者的作用得到加強”（南共綱領草案），“國家不再是資本主義社會某一階級的機構了，它不再反映和維護這一階級的特殊利益了”（爾·伊：“資本主義變化了嗎？”載南斯拉夫“我們的實況”一九五六年十月號）。他們這樣美化帝國主義國家的国家政權，不是同帝國主義者一鼻孔出氣嗎！

我們時代的特徵是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工人階級必須經過這樣或那樣形式的革命，來打破資產階級的国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的国家機器，用無產階級專政來代替資產階級專政。所以，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從來就認為，奪取政權問題是無產階級革命的中心問題。南斯拉夫修正主義用詭辯的方法硬說，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国家資本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因素”，社會主義正在資本主義制度內部形成起來，資產階級的国家機器也正在“沿着這個方向發生變化”，因此，工人階級無須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無須打破資產階級国家機器，也無須建立工人階級自己的国家機器，只要對資產階級的国家機器“不



断施加压力”，爭取在这种国家机器中“起決定性的影响”，就可以“保证社会主义的發展”。他們宣传这样一种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演变”的謬論，其目的是要在革命工人运动内部制造思想混乱，麻痹、腐蚀和瓦解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革命意志，取消无产阶级革命。这样，他們身上除了帝国主义帮凶的影子而外，还有什么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子呢？

从伟大的十月革命以来，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类已經打碎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自己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同一切剥削阶级的专政在性質上是根本不同的。它是被剥削阶级的专政，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是为着創造沒有人剝削人現象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专政。这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也是最后一次的专政，担负着历史上最伟大最困难的消灭阶级的任务，并且是在历史上情况最复杂和道路最曲折的斗争中前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还只有四十年，它在自己的前进道路上不可能不犯这样或那样的局部錯誤。而无论犯怎样的錯誤，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是人民自己的制度，可以从錯誤中得到教訓，并且可以经过这个制度本身糾正这些錯誤。可是，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却跟在帝国主义反动派后面，用一切恶毒的語言来攻击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他們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制度說成是什么“官僚主义和国家官僚主义”。他們还極力攻击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誣蔑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由于对国家工作的直接领导和监督而产生了“党的官僚主义化”和“極权主义化”。一眼可以看出，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攻击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武器，都是从帝国主义的武器庫那里搬来的。不过因为他們憑着所謂“共产党人”的資格，仗恃着所謂“社会主义国家”的地位，又披着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舞弄起这些陈旧不堪的武器，所以就能够得到美帝国主义的特別賞識和喝采。

所有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著作家都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把自己組織成为統治阶级。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必須经过自己的国家机器，对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实行专政，在新的条件下繼續进行阶级斗争，解决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誰胜誰負的問題，以达到消灭阶级的目的。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却認為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不应当成为强力的工具，不应当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不应当进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間的斗争。与此同时，他們还在所謂民主問題上大做文章，借口發展什么“民主”来攻击社会主义国家。铁托制造了一种借口說，“我們經常强调反对把无产阶级专政只有成强力”，好象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专政而没有民主。由于过渡时期还存在着阶级敌人，它同无产阶级發生着敌我之間的对抗性矛盾，因此必須实行专政才能解决这种矛盾。至于說到民主，任何民主都只是阶级統治的一种形式。离开



了无产階級專政的民主，決不是什麼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民主。資產階級的民主在實質上是少數人對大多數勞動人民的專政，而无產階級專政同時就是大多數勞動人民的民主。有敵無我，一個消滅一個，有資產階級民主，就沒有无產階級民主，反之也是一樣。无產階級專政是專政和民主的統一。毛澤東同志說過：“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结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①“專政的制度不適用於人民的內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專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壓迫另一部分人民。”^②“在人民民主專政下面，解決敵我之間的和人民內部的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採用專政和民主這樣兩種不同的方法。”^③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把民主和專政對立起來，而又空談什麼抽象的民主，否認對階級敵人實行專政的必要，否認在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進行鬥爭的必要，只不過是配合帝國主義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的顛覆活動，企圖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製造混亂。

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借口斯大林在无產階級專政問題上犯了個別錯誤，興高采烈地夸大這些錯誤來攻擊社會主義國家的无產階級專政的制度，卻沒有想到他們這樣做恰好把自己的修正主義面目暴露了出來。不錯，斯大林曾經把過渡時期階級鬥爭的規律估計為“日益尖銳化”，這種估計可以被了解為階級鬥爭的不斷擴大，從而對社會主義事業造成了不利的後果。但是，這並不是說，為了糾正這個錯誤，就應當否認過渡時期的階級鬥爭，否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誰勝的鬥爭。事實證明，不僅在无產階級專政的初期，在消滅資本主義所有制和建立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時候，誰勝誰負的階級鬥爭是存在的；而且在所有制問題完全解決以後，在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還存在着誰勝誰負的階級鬥爭。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鬥爭的問題上，既有敵我矛盾，也有人民內部矛盾。當然，過渡時期的階級鬥爭是時緊時松、曲折前進的。在一次鬥爭回合中无產階級取得勝利以後，階級敵人被迫退却，鬥爭形勢可能一時地緩和下來。但是，階級敵人決不會甘心死亡，在某種條件下他們又會向社會主義發起新的進攻。這種階級鬥爭的起伏形勢，將在一定時期內多次地反復，而隨着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总的趨勢是，階級鬥爭將通過這種起伏而逐漸地減弱以至熄滅。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否認這個客觀規律，誹謗社會主義國家通過國家的威力而加劇了社會矛盾，這除了證明他們是幫助帝國主義，反對无產階級專政，反對消滅階級之外，難道還能有別的解釋嗎？

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特別攻擊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民主集中制，把集中制說成是一切禍害的根源。他們搬出“巴黎公社”的經驗來招搖撞騙，把馬克思所說的巴

①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

②③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黎公社的經驗至曲成为消灭集中制，这是对于馬克思和高举巴黎公社旗幟的法国无产阶级的侮辱。正如列宁所說，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經驗的时候，“絲毫也沒有离开集中制”^①。社会主义国家在人民内部不是实行专政而是实行民主，也就是民主集中制。在人民内部，民主和集中，分权和集权，都是对立的統一。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極端民主化；集中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不是绝对的集中。分权也是統一领导下的分权，不是无政府状态；集权也是發揚下層組織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自动性基础上的集权，不是限制和妨害这种积极性和自动性的绝对的集权。任何強調一面反对另一面都是錯誤的。当然，在社会主义建設过程中，由于經驗不足，过分的集中或者过分的分权都是可能發生的，但这不过是民主集中制的运用問題，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結果。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詆毀无产阶级国家的集中制，这只是証明他們攻击社会主义国家的别有用心目的。关于被他們所绝对化了的什么“社会自治”，我們只要举出恩格斯的話來說，“把权威原則描写成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則描写成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謬的。”^②也正如恩格斯所說，誰要坚持这种荒謬的观念，誰就是在实际上为反动派效劳。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特別卖力地攻击社会主义国家对于經濟生活的管理。他們把事情說成是，只要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管理国民經济，就要使国家变成什么阻碍社会主义發展的因素。这是一种特別奇怪的邏輯。世界上难道有不管理經濟的国家么？只要有国家存在，国家都必然经过不同的方式管理經濟。而更奇怪的邏輯是，当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談到帝国主义国家政权管理經濟的作用日益加强的时候，并不認为这有什么不好，相反地加以極口的称贊，美化成为“社会主义因素”；而在談到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管理經濟的作用的时候，就不惜加以貶責，丑化成为“官僚主义和官僚国家主义”的根源。这不正是暴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經濟的反动本質嗎？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著作一再指出，无产阶级国家必須作为社会的代表来組織社会主义經济。无产阶级国家为什么必須管理經濟呢？第一、是要进行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两条道路誰胜誰負的斗争；第二、是要在一切經濟工作中貫徹执行无产阶级的階級路綫和階級政策；第三、是要从全国全民出發，根据社会主义經濟發展的客观規律来保証社会主义国民經济的有計划的按比例的發展。正是由于国家政权有計划地管理国民經济的結果，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經济建設才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当然，国家在管理經濟的时候，中央和地方应当有适当的分工和协作。中央的統一管理和統一計划必須同地方和群众的积极性和自动性正确地結合起来。中央和地方無論在經济管理方面怎样分工，劳动人民怎样参加管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416頁。

② 恩格斯：“論权威”，“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613頁。



理，都只是管理经济的具体形式问题，而不是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是否取消的问题。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所谓取消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职能是意味着什么呢？除了被他们当做骗人的把戏之外，不过是为了破坏和取消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取消计划经济，取消无产阶级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方面的阶级路线和阶级政策，取消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和通过国家机构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统一的领导和监督，恢复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方法，保存和恢复资产阶级的自由，便利于资产阶级的复辟。

在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国家论的时候，必须谈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问题。我们有些同志曾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存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从而否定了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内部的矛盾，否定了作为国家政权机关的人民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用这种观点来指导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既不能及时地克服上述的矛盾，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更好地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更好地适应于经济基础的发展，同时也就不可能根据丰富的实践经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向前推进一步。但是，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却把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归结为主要是国家政权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又把这种矛盾说成是对抗性矛盾，并且认为国家的存在就是这种对抗性矛盾的根源。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胡说相反，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对抗性矛盾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和反抗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之间的矛盾。为要解决这种对抗性矛盾，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而并不是由于无产阶级专政，才产生了对抗性矛盾。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把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人民内部矛盾和我矛盾混为一谈，把社会主义制度内部的矛盾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内部的矛盾混为一谈，以此来攻击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毛泽东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内部的矛盾，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内部的矛盾根本不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是团结一致的，和剥削阶级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阶级对抗矛盾是根本不同的。人民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因此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这些矛盾都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能够加以克服和解决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把这种矛盾夸大成为对抗性的矛盾，无非是为了达到污蔑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为了攻击社会主义国家，他们根据自己捏造的理由，把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说成是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源，认为只要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存在一天”，官



僚主义就“仍将作为一种倾向而出现”。人们知道，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国家统治机构的产物。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国家机构中存在着的官僚主义，正是旧社会的遗毒，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本身的产物。这种官僚主义同工人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是根本不相容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证明，只有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才能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因为只有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才能够尽量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和积极作用，也只有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和积极作用的无限发挥，才能够克服受旧社会影响而产生的官僚主义。这就是说，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坚决地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进行斗争，才能够克服官僚主义。而要进行这一斗争，就要一方面，自上而下地领导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造，不断地克服自己的错误的思想和作风，不断地改进自己的工作方法；另一方面，还要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和觉悟程度，实行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的有效监督，领导群众进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我国的经验也说明了这一点。我们找到了适合我国情况的全民性整风运动方法，依据“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用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的形式，放手发动群众，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就使得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生活得到巨大的跃进。我们不妨在这里问一句，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敢不敢实行这样广大的民主？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还攻击了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领导作用。他们不承认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借口反对“党政不分”，说党对国家的直接领导和监督是不对的，并且认为“党和国家紧密结合”的结果，必然是党的“官僚主义化”。列宁的建党学说强调指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只有工人阶级政党，即共产党，才能在政治上领导无产阶级，通过无产阶级来团结全体劳动群众以实行专政，“不如此，便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①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所证明了的真理。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的首要经验就是，没有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密切联系群众，力求成为劳动人民的核心，并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教育自己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共产党，无产阶级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不能前进一步。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方面，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方针政策方面，党必须起领导作用，因此，党政是应当不分的。如果党政分家，使政府脱离共产党的领导，是完全错误的。当然，党和政府应当通过不同的形式来进行工作，而不用由党来包办政府机关的日常事务。无论如何，加强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国家机构的领导，这是我们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团结人民战胜敌人的基本保证。南斯拉

① 列宁：“俄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内工人团义与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案案”，“列宁文选”两卷集第2卷，826页。



夫修正主义者公然背叛列宁的建党学说，这样不遗余力地攻击社会主义各国的共产党，还要以共产党人的名义招摇撞骗，岂非恬不知耻吗？

南斯拉夫领导集团对外实行一种适合帝国主义需要的、赞颂美国、中伤苏联的外交政策，而对内又实行一种取消两条道路的斗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允许资本主义关系和美国生活方式自由泛滥的政策，这就明明白白地标志着南斯拉夫领导集团的蜕化和叛变。这样，这个领导集团就同南斯拉夫人民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南斯拉夫领导集团不愿意也不敢干脆摘掉“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招牌，因为这样做，不但要遭到南斯拉夫人民的强烈反对，而且也将失掉对社会主义阵营的破坏作用，从美帝国主义者那里再也拿不到奖金。所以他们必须挂羊头卖狗肉，既要取得帝国主义的奖金，又要蒙混国内群众，缓和国内人民的不满，以掩盖他们的蜕化和叛变，于是就七拼八凑地猎集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提出了一套所谓“国家消亡论”。

这个徹头徹尾修正主义的国家消亡论，主张必须消灭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作用，而实际上是要“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对阶级敌人的专政作用，“消灭”人民内部的民主集中制，“消灭”国家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管理职能，“消灭”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作用。总之，他们要消灭的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照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这样做，那便是对于国家消亡论的“实用主义的修正”，会导致“官僚主义的国家集权主义倾向”的出现，“妨碍社会主义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发展。”如果真的按照着他们所说的那么去做，那就只能便利于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破坏和颠覆活动，只会导致匈牙利反革命事变的重演，只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这也就是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向外推销“国家消亡论”的真实企图。

那末，这个徹头徹尾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消亡论”，在南斯拉夫国内又是如何实行的呢？他们的主要国家机器——警察、法院、军队和其他镇压机关，不但没有削弱，没有消灭，而且还在大大加强。他们既然为了实行和巩固他们自己小集团的统治和独裁，他们就要运用国家机器来镇压那些反对他们的人。去年南斯拉夫就有三万多工人（占工人总数的4.3%）因为对领导者提意见受到打击报复而被开除；最近路透社又报道他们在国内正在对那些反对他们的反动政策的人进行大规模的猎捕。而同时，他们又要拿什么“社会自治”“工人自治”来欺骗人民群众，胡说什么他们的国家正在“消亡”中。事实上，他们这种倒行逆施，真正使南斯拉夫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走到了“消亡”的危险边缘。就国内的作用来说，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国家消亡论”不过是他们的蜕化和叛变的遮羞布罢了。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同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是真正的国家消亡论者。根据马克



恩列宁主义的原理，毛泽东同志说过，国家消亡的条件，在国内，是阶级的消灭和阶级影响的消灭；在国外，是帝国主义制度的消灭。随着国内的阶级斗争的逐渐减弱以至熄灭，镇压职能就会自然地减弱下去，并且向着消亡的方向发展，这是一个长期地自然发展的过程。同时，不能忽视国外条件，而国外条件和国内条件也是互相影响的。列宁说：“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就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那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经消失，因而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也就消失，而这个根源光靠生产资料转为公有财产，光靠剥夺资本家，是决不能立刻消除的。”^①因此，国家消亡过程的长短，“将取决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发展速度”^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消亡论，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关于国家消亡的反动谬论，是毫无相同之点的。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在大谈特谈所谓“国家消亡论”的时候，用尽一切恶毒的语言集中攻击斯大林。他们诬蔑斯大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理论作了“实用主义的修正”，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消亡论变成了“国家不在消亡，而必须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里日益加强”。苏联和苏联共产党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丰富经验是有世界意义的。斯大林提出了关于国家的镇压职能、管理经济职能和教育小生产者的职能，和他所说的国家消亡首先是从镇压职能逐渐地、自然地消亡，而国家的经济职能将要作为社会的职能保存下去，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虽然斯大林在国家问题上正如苏共中央所指出，是有个别错误的，但是，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对敌斗争中坚强不屈的战士。充当了工人阶级叛徒的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怎么也不可能对斯大林作出任何公正的评价。他们污蔑苏联曾经实行过什么“个人统治”，对此我们可以拿列宁的话来回答：“一般地把群众专政与领袖专政对立起来，那就是荒谬愚蠢到可笑的地步。殊不知在‘打倒领袖’这个口号掩饰之下，实际上却把一些胡言乱语，怪诞百出的新领袖抬出来”^③。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所想抬出的新领袖，不是别人，正是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投靠美帝国主义的新伯恩斯坦。

综上所述，可见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关于资产阶级国家的性质，关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及其作用，关于国家的“消亡”等等问题的谬论，都是彻头彻尾反动的。为了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理论，我们必须坚决地粉碎这种修正主义。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第455页。

② 同上。

③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文选’两卷集第2卷，第709页。



美帝国主义在南斯拉夫的賭注

伯 达

五月十七日，美国“星期六晚邮报”發表該報編輯溫斯特·豪塞爾一篇题为“我們對南斯拉夫的賭注是否上算”的文章。单从題目也可以知道，作者显然是美帝国主义的發言人，但是，文章却值得馬克思主义者和南斯拉夫人民讀一讀。文章是在貝爾格萊德写的。除了照例对于苏联和苏联的頌扬，对于社会主义陣营，作了不少无耻的污蔑之外，作者因为經過一番实际的接触，所以頗为出色地写出了南斯拉夫的真相。铁托是誰的伙伴？是帝国主义的工具，还是南斯拉夫人民的公僕？作者完全赤裸裸地回答了这些問題。

帝国主义者当然要談他們的生意經。而且，奴才既然是“活商品”，可以买卖，所以帝国主义者也就会談到奴才的价值。作者这样設問：

“铁托對我們有什么价值呢”？

这就直接地提出了美帝国主义对铁托值不值得投資，值不值得付出高价的問題。

美帝国主义給铁托的錢，究竟多少，其說不一。作者說，“美国到現在为止，对铁托的独立，投資了将近十五亿美元，

約七亿美元的經濟援助，加上七亿八千万美元的軍事援助”。这个数字比起本刊前一期根据美国和南斯拉夫报刊的材料統計起来的数字，要少得很多。不过，在这里，詳細追究具体的数字，并沒有必要。有一点是不会錯的：对帝国主义者說来，铁托当然要比猶大值錢。猶大只得到了三十塊錢的代价，现在美帝国主义付給铁托的，却是这个数字的万万倍。除此以外，也还有差別：猶大出卖的，只是一个耶穌，現在铁托出卖的，却是南斯拉夫人民。

作者用強烈的筆調，写出美帝国主义者是铁托的“救命恩人”。作者說，铁托自从脱离了社会主义陣营之后，簡直“一年也过不下去”，“多亏西方，特别是美国悄悄的干預”，才拯救了他，而“自从那时起，我們就一直帮助使他能活下去”。

作者談到武器的輸出。他說，到去年年底，“很幸运，主要的目的已經达到了；我們的坦克、槍支、噴气飞机，載重汽車和吉普車，已經給铁托以他們所需要的更大的信心”。

铁托本人現在所以能够“常常在老远



的布里俄尼島上消磨很多時間，同他的家庭、朋友、狗和馬一起欣賞亞得里亞海的太陽”，不能不感謝美帝國主義者的恩德。

可是，帝國主義者的投資，向來要求一本萬利，总要取得一個投資的效果。作者說：“我們沒有對援助附加什麼條件。從一開始，我們就相當明確地表示我們並不期望直接的償還”。前一句話當然是張天謨。世界上那裡有什麼投資不附條件的帝國主義呢？後一句話倒有些道理，因為帝國主義者按照行情，有時也放長綫，而所謂間接償還的利益，或許更大於直接償還的利益。不過，鐵托恐怕美帝國主義者對他不信任，報效总算不慢。

在買賣之間，美帝國主義者經過鐵托的手，使南斯拉夫在實際上失掉自己的獨立。

美帝國主義者是怎樣地把南斯拉夫的經濟生活套在自己的馬車上的？作者寫道：“早期，我們提供的貨物，除重要商品外，包括金屬、化學品、機器等。今年南斯拉夫消費的每一塊面包中有十分之七的面粉是來自美國”。這一點很可以說明，為什麼南斯拉夫許多人到現在還很不容易察覺自己在“美國悄悄的干預”之下，已經悄悄地被人出賣。同樣，這一點也可以說明，為什麼南斯拉夫竟會成為“美國的宣傳節目的對象”，為什麼——象作者所說——西方來的旅客竟會把南斯拉夫叫做“小美國”。

就是在上述的情況下，南斯拉夫原來

在革命中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悄悄地在發生變化。例如，在一九五三年，鐵托集團“允許南斯拉夫農民脫離他們的集體農莊”。又例如，關於南斯拉夫的所謂“工人委員會”，按照鐵托集團平日說法，似乎那是他們的“偉大創造”，但按照美國報紙作者訪問一家工廠的所見所聞，却是這樣一回事：“听他們談到‘他們的’工廠時，就象一家公司的股東一樣。其中一個人說，在俄國和羅馬尼亞，他們沒有這樣一類東西”。是的，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確實找不到象南斯拉夫這樣的股份公司。所有這類變化，作者叫做是：鐵托“向某些比較符合人性的東西作了讓步”。

作者特別滿意地說到：“在戰後最初幾年內，鐵托給了我們優厚的報答。他們封閉了南希邊境，禁止希臘共產黨的軍隊在他的領土上避難和整頓，從而加速了希臘共產黨的失敗；……一九五四年他同希臘、土耳其簽訂了巴爾干條約（這兩個國家都是北大西洋公約成員國），從而使得他這個陷於孤立的國家和西方的防禦體系之間建立了聯繫”。

為什麼鐵托在南共七大大會上要說什麼“斯大林執行的政策是簽訂大西洋公約、建立軍事集團的基本原因”這類的鬼話呢？豈不就是因為鐵托同大西洋公約組織這個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軍事集團建立聯繫的緣故嗎？

作者還特別滿意地稱贊鐵托“毫不猶豫地鼓勵”一九五六年匈牙利反革命叛



乱，称赞铁托“以背痛为借口，拒绝到莫斯科去参加纪念列宁革命的四十周年的邀请。”最后作者又称赞铁托集团“上个月在代表大会上放了一个鞭炮，”叫做“好消息！”

当然，帝国主义者并不认为单有一个铁托统治的南斯拉夫即可以满足。作者狂妄地说到，他们希望能够有“两个，三个或半打的南斯拉夫”。对于这点，铁托在帝国主义面前相当自命不凡，而且自告奋勇。以下是作者的一些特写：

“铁托自己很清楚地意识到他的吸引力，并且很巧妙地在利用它”。

“铁托是有意識地輸出铁托主义”。

“一位南斯拉夫高級官員对我說，‘不要忘记，我们在东欧起作用，这是任何人不能代替的’”。

奴才們要博得主子的欢心和奖赏，总是在那里不断地吹嘘自己。但是，铁托主

义这个商品早已發臭，除了帝国主义者給它大登广告和铁托們自我欣賞以外，很难說有什么市場。以当帝国主义走狗而自鳴得意的铁托集团，总有一天是会遇到失意来向他們叩門的。

作者得出結論說：照南斯拉夫的現狀，“不能不使人感觉这是我們方面的一个冷战胜利”。“看来是，铁托的利益在将来很长時間与我們的利益是一致的”。“我們就是那个目的在于破坏克里姆林对东欧的控制（帝国主义者总是要这样胡說八道地称呼伟大的社会主义陣营）的唯一的从内部进行的工作中的伙伴”。“正如一个美国观察家所說，我們在这里，我們就在前进”。說铁托是他們的伙伴，当然不錯；但是，說到什么“胜利”啦，“前进”啦，帝国主义者总未免过分乐观，未免过分自信，因为，铁托究竟是坐在他自己所造的沙塔上的。

征 稿 啓 事

本刊歡迎投稿。稿件內容包括政治評論、經濟評論、哲學評論、历史研究、工作通訊、文艺批評、民歌等。寄来的稿件請抄写清楚，註上通訊地址，直接寄本杂志編輯部。來稿不用時，可以退还。



病树前头万木春

——从泰晤士报的一篇評論談起

胡乔木

中国共产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會議閉幕以后不几天，英国的泰晤士报在五月三十一日發表了一篇题为“‘大跃进’年”的評論。这篇文章这样描写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在这些行話連篇的紙頁中，我們可能找不到任何有生气的、新穎的或者有希望的見解。……由于过去八年的努力，人民一定有点松懈下来，必須做一些使他們重新活跃起来的工作，因此就把今年定为‘大跃进’年。这个口号后面并没有具体目标。现在的目标仍然是要費很大力气才能达到的遙远的目标，因为农业綱要——現在已經是第三次修訂了——的限期是十二年，而在‘超过英国’的运动中也是答应在十五年后才取得胜利。”社論作者随后按照自己的观点，对报告所提出的經濟政策作了一些零星的介紹，并且接着說：“在某些方面，这給了那些勤勞的人們一点鼓舞。虽然其中大多数人一定是辛苦地劳动而无暇苦恼，而且到现在一定有愈来愈多的可以看得見的进展的迹象，然而，在今天的貧瘠的思想土壤中，欣欣向荣、生气勃勃的气象是难以出現的。”

这样的評論跟我們眼前的沸騰着的生活是一个多么奇异的对比！这使我們想起唐朝詩人刘禹錫的两句詩：“沉舟側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帝国主义的西方已經象沉舟和病树一般地衰老了，腐爛了，但是社会主义的东方却正如千帆竞發，万木爭榮，蓬蓬勃勃，前途无限。衰老的西方对于青春的东方不但不可能追赶，而且不可能理解。西方的資產階級在他們的破落的世界里苟延殘喘。在他們的階級里，确实已經找不到任何有生气的、新穎的、有希望的东西。因为这样，資產階級的頑固派也就不願意有見、不願意相信、不願意認識劳动人民所創造的一切新事物。泰晤士报評論家用那样阴暗的眼光来看刘少奇同志的报告，認為里面尽是无法了解的“行話”，正是理所当然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資產階級統治者曾經用各种好听的話来欺騙人民，用各种强制的方法来胁迫人民，使人民为了統治者的利益而紧张地劳动，但是人民群众总是用松懈、不信任和不合作来回答他們。坐在倫敦泰晤士报社里的評論家，根据資產階級統治者的經驗来观察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生活，不能不断定中国人民在經過八年努力以后，“一定有点松懈下来”，“一定是辛苦地劳动而无暇苦恼”，一定是不会出现“欣欣向荣、生气勃勃的气象”。同泰晤士报的評論相映成趣的是，有一个“不在倫敦而在八千英里以外的中国首都北京”的“每日快报”的記者艾利斯，在他五月十四日关于北京十三陵水庫的义务劳动的通訊中說：“我曾



怀疑所谓军民自愿参加这里的劳动，其实不过是军队点名指定的老办法。可是，这里是真正的自愿，而且有人等着排定他劳动的名单。……这些中国人是以一种罕见的热情和努力在进行工作，这种热情和努力只有大学船赛的场面中可以相比。这是人民对共产主义的一种真心的热情。是政府抓住人民的心愿，把全国的意志鼓动和动员起来的一个活生生的范例。”

但是，即令在英国的资产阶级报纸上再多发表几篇这样的报道（它们至多只能反映中国人民的革命热情的万分之一，而且必然带上种种成见），也决不会改变英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资产阶级的头脑。历史上的一切反动的阶级、反动的政治力量，从来不能如实地观察客观世界。他们总是把自己的力量估计得过高，把违抗他们的意志而兴起的进步阶级的力量估计得过低。封建的统治阶级以为自己的统治是永久的，他们不相信农民和资产阶级有力量推翻他们。同样，当资本主义已经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物的时候，资产阶级也仍然相信资本主义可以永远存在下去，不相信无产阶级可以摧毁资本主义制度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苏联出现了，他们断定苏联活不长。苏联提出第一个五年计划了，他们断定那是一个梦想。世界第二次大战爆发了，他们等待着希特勒征服苏联的时间。当中国革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他们又把这种算盘重打一次。蒋介石在一九四五年拒绝国内和平，在一九四六年发动全国性的内战，是因为他和他的主人美帝国主义者认为，优势断然是在他们方面。蒋介石完蛋以后，美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又认为，中国人民政府将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除非依靠美国的援助。一九四九年八月，美国当时的国务卿艾奇逊在给总统杜鲁门的信中曾经宣称：人口之多“对于中国成为一种不胜重负的压力”，没有一个中国政府能够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由于相信中国革命的胜利不可能巩固，他公开号召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起来打倒人民政府。毛泽东同志当时在一篇评论中驳斥艾奇逊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从那时到现在，九年快过去了，究竟是谁对了呢？不吃美国面粉的中国人民不但没有饿死，而且比以前活得快多了。我们的人口更多了，但是我们的进步比人口的增加快了不知多少倍。在中国，坚持悲观论调的人还有，但是他们被包围在乐观的人们的汪洋大海中，只有他们自己的命运才是值得悲观的。

是否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根本界线，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真马克思主义者和假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界线。你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你就必然相信那些表面上强大的反动势力不过是迟早要灭亡的纸老虎，必然相信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相信人民群众一定能



够战胜一切压迫，創造一切人間奇迹，無論在人民群众面前有多大困难也不会动摇。相反，你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場上，站在反馬克思主义或假馬克思主义的立場上，你就必然把假象当作本質，必然認為帝国主义的金元和氢弹将決定一切，而有不起暂时显得比較弱小的人民群众的力量。伯恩施坦、考茨基、普列哈諾夫等人之所以背叛无产阶级的事业，根本上就是因为他們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同样，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者之所以不敢在国际的阶级斗争中站在社会主义阵营方面，所以把暂时还好像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奉若神明，無論他們怎样花言巧語，實質上也无非因为他們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他們在反法西斯斗争中所曾經有过的革命性，在他們取得胜利以后逐渐丧失了，現在他們簡直不知道沒有了美国的面粉和金元怎样能过活。因此，他們就只能把他們的矛头針对着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各国共产党。

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中，不相信人民群众力量的资产阶级思想也不会毫无影响。无产阶级并不是生下来就能够辨别假象和本質，就能够懂得帝国主义必然要否定自己的方面發展。这样，馬克思主义者就有了任务：要宣传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要說服那些对敌人力量估計过高而对自己力量估計过低的人們，要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作斗争。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由于进行了这样的斗争，才能够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才能够提出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英勇口号。

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当我们真正把人民群众的干劲鼓足以后，我們很快就發現，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其实是有些落后了。泰晤士报不知是否出于无意，沒有指出我們的口号在这次代表大会的會議上已經加了一个插語：“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內”。六月六日人民日报發表的煤炭工业部长張霖之同志的文章預計，在一九五九年，中国的煤产量就将达到或超过二亿四千万吨，而英国煤产量在一九五七年只有二亿二千万吨。鋼鐵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超过英国的时间也将比十五年少得多。例如六月七日的人口日报載，仅仅在今后一年內，全国就将新建上万家中小型高爐，只是它們的产鉄能力就将超过二千万吨，这个数字比英国一九五七年鉄产量一四五三万吨超出三分之一以上。我們实现农业發展綱要也不需要到一九六七年。如譚震林同志在代表大会上所說，很多省、市、自治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間，即在一九六二年以前，就将达到农业綱要的水平。

讓英国紳士們繼續他們的好夢吧。病树前头万木春。無論如何，中国是在向着并不遙远的具体目标跃进，完全不用十五年就一定超过英国。六亿中国人民所进行的这场大斗争，它的意义是显而易見的。我們在这里只要指出一点：曾經如此落后和如此被压迫的中国人民能够做到的事，全世界任何落后的、被压迫的民族一定也能够做到。唯一的条件，就是人民群众必須堅決相信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为新生活奋斗，永远不向帝国主义者低头！



水力和电力結合, 乡社工业遍地开花

张桂如

(一)

永春县是福建省晋江专区一个山区县, 境内山巒起伏, 溪流密布, 水利资源极为丰富, 工农业生产潜力很大。但是解放前这里却是一个很贫穷的地方, 粮食产量很低, 全县平均每年缺粮三个月, 根本没有什么工业。一九五六年农业合作化以后, 永春县由缺粮县一跃而有余粮县。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 在我们面前提出了发展地方工业的要求。永春县委貫徹执行了地方工业为农业服务的方针, 依靠群众在县、乡、社各级举办各种小型工业。到目前为止全县已有水力、水电站、联合加工厂以及机械、煤矿、炼铁、硫矿、肥料、磁器等厂矿七十多个。平均每乡就有二个多小型工厂, 全县已有半数以上的乡有了电灯。

地方工业的发展对农业的跃进起了很大的作用。农业社办的联合工厂能加工农副产品三十多种, 全县百分之六十以上粮食实行了机械加工, 仅这一項就节省了六十万个劳动日, 如果用来耕种土地, 就可以增种二万五千多亩。谷糠、薯藤、稻草等过去都是当柴火烧的, 现在经过加工却变成了精饲料。仅一九五七年加工饲料即达一千多万斤, 可以饲养生猪五万头。这些加工工业的发展, 大大地有利于农村妇女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投入农业生产。因此她们感动地说: “有了水电站, 妇女最喜欢, 热天不煮米, 冷天省磨面”, “有了工业, 是七改后第二次解放”。

永春县地方工业的蓬勃发展, 向广大群众更明确地指出了社会主义美好前景, 大大鼓舞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干劲, 进一步巩固了合作社制度。过去山区农民对山区实现机械化是将信将疑的, 他们说: “铁牛能在平原跑, 不会上山来吃草”, “人家搞社会主义, 我们拜神仙土地”。发展了地方工业以后, 他们歌颂道: “山上建厂人心爽, 山区江山日日旺”, “做了一辈子的梦, 也没有想到会有今天的好光景”。有些青年男女过去认为“鲤鱼出大溪, 好命人不在山区里”, 因而盲目流往城市; 现在又回到农村来了。地方工业的发展正在农村发生日益深远的影响, 已经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开始改变着山区的面貌。



(二)

永春县地方工业发展的道路，主要是依靠群众、全民办厂。有些同志不同意这条正确的道路，他们认为“农业靠群众，工业靠国家”，“办工业就得国家拿钱，群众出工拿工资，这才是群众观点”。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这种错误的意见被克服了，正确的方针得到了胜利。事实证明，办地方工业是群众的迫切要求，因此，在县委提出“有力出力，有钱投资，有料献料”的口号之后，就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支持，到处形成了群众举办工业的热潮。例如，美山农业社举办的有十八匹马力的水电联合加工厂，装有碾米、磨麦、磨薯三部机器，全部建厂费花了四千多元，国家分文未拿，农业社也一文钱没出，全部是社员出钱、出力、出料建成的。碧溪农业社的水力工厂，共有六间厂房，全部都是由群众自己动手建成的，社里只花十七元买铁钉材料。

(三)

办地方工业的一个很大困难是缺乏技术力量。永春县技术力量原来是很薄弱的，全县只有一个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的技术员。但他们完全依靠自力更生，克服了技术上的困难，并且在实践过程中，建立了自己的技术队伍。现在全县的机械、炼铁、水力、水电等各种不同程度的技术员工已经有一千人。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把这样一支技术队伍建立起来，是用的是什么办法呢？这就是：走群众路线，在实践中培养，边学边作，现场训练，短期训练，外地参观，老厂帮新厂，师傅带徒弟，老徒弟带新徒弟。这种办法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做中有学、学中有做的办法，是培养技术力量最快最好的办法。例如现在实际上担任全县水力、水电总工程师工作的郑声霖，今年才二十五岁，原来只在初中读过一年半的书，一九五六年还是一个电工学徒，在水电训练班学习了半年之后，由于继续刻苦钻研，实地施工锻炼，迅速提高了技术水平。他独自设计五个较大的水电工程，经过洪水考验，证明设计良好。又如农具厂技工黄自端，两年前还是一个作床铺家具的木匠，由于刻苦钻研，学会了机器安装工作，已安装了二十多个工厂。郑、黄二人是新生技术力量的代表人物，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一支土生土长的、又红又专的技术力量正在迅速成长起来。永春县农具厂一九五六年在一座康熙年代建的破旧祠堂里建厂，开始时只有厂长、技工和学徒共三人，手摇车床一架，资金一万三千元，以后逐步增添“老爷车床”四台和员工十多个人。他们开始翻砂的废品率百分之八十以上，但困难没有把他们吓倒。工人们说：“三个臭皮匠赛个诸葛亮，没有好医生来个群医会诊”。就这样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使废品率降低到百分之六。试制第一部水轮机的时候，连续



失敗九次，開過十八次“諸葛亮會議”，終於在第十次成功了。以上事實證明，勞動人民中蘊藏着無窮無盡的創造力，只要思想解放，方向正確，不懂技術可以學會技術，技術水平不高可以提高，當時當地技術上不能解決的問題，可以發明創造。人們是從兩頭去學習掌握技術知識的，一頭是從書本上學，一頭是從實踐中找，兩頭結合起來是最好的辦法。



(四)

水力電力結合，小型為主，綜合利用，服務農業，是永春縣地方工業的特點。所謂水力、電力結合就是充分利用水力資源發展水力站，並且在普遍發展水力站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電力站。永春縣提供的經驗，只要有水流的地方，作一個落差，按上水輪機，掛上皮帶，就可以成為動力。這樣的水力站，不但山區有河流的地方可以搞，就是有一條小溪流的地方也可以搞。這是最經濟的動力，人們把它叫做“不花錢、燒不盡的白色煤炭”。這樣的小型水力站（從二匹馬力到五、六十匹馬力），可以帶動加工機械，可以用來抽水灌溉，有了發電機又可以發電，所以我們叫它是水力、水電站。在農村普遍建立了水電站之後，如何擴大電力用途，例如用電力耕作，試制電耕犁等，這就是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新課題了，必須逐步加以解決。

社辦的水力、水電站要以小型為主，才能迅速遍地開花。例如桃溪農業社建立了一個水力站，是利用二尺寬的灌溉渠道，作了流量零點三秒公方、一點八公尺的落差，動力二匹馬力。這樣一個水力站，只花一百二十三元，三天就建成了。這個小水力站帶動脫粒、磨糞兩部機器，在四十天內可以加工番薯八萬多斤，一個季度就能夠把全部投資收回來。象這樣的小型水力加工廠，不僅合作社可以辦，生產隊也都可以辦。

水力水電站建成後，必須綜合利用，積極擴大服務範圍。永春縣除較大量地搞糧食飼料的加工外，還利用水力動力打稻打麥，製造顆粒肥料，破碎礦石，加工瓷土，鋸木榨油，榨茶制漿，以及抽水灌溉等，現在他們正在試制電耕犁。

(五)

在貫徹執行“面向農村、滿足農民需要、為農業生產服務”這個方針的實踐過程中，永春縣農具廠創造了一套有革命性的也是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他們試制“閘一式”深耕犁的時候，由於沒有請教農民，制成了一百部成品沒有人要，農民說：“太笨，太重，太貴”。以後又試制“閘二式”深耕犁，他們不再是坐在廠里“閉門造犁”，而是由廠長、技術員扛着犁到處請農民試犁，“醫犁病”。農民沒有空就把犁放着，對農民說：你們試試看，



弄坏了也不要紧。由于多方征求农民意见，经过多次改进，最后制成的深耕犁就大受欢迎，成为畅销的产品。从此以后深入田间，请教农民，把产品交给农民试用，就成为这个农具厂生产各种新农具的一种经常制度。一年多以来他们生产了农具和机器达十九种之多，供应各种机器二百多部，新式农具一千多件。这些机器和农具不但适合群众的需要，而且“成本低，买得起；质量高，用的久”。他们所造的机器大部分是木质的，一个铁质二十五匹马力水轮机价值一千多元，而木质的只要一百四十元，可用十年。他们还订出了一套“包修、包退、包换”的制度。如过去生产的脚踏番薯切片机不好用，效率比手工还低，该厂就把已出售的七部原价收回，重新改装，农民非常满意。现在群众称这类厂是“万能厂”，说这类厂里有“万能机”、“万能人”。所谓万能厂，就是农业上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所谓万能机，就是设备利用率高，产品多样化；所谓万能人，就是人少作事多，是厂长又是会计，是工人也是炊事员，是工人又是农民，白天加工，晚上算账，什么都干。正因为这样，这些工厂的产品成本很低，能够很好地服务农业，便利群众，所有的县、乡、社办的工业都应当保持和发挥这个优点。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永春县地方工业已经有了一个初步基础，他们计划在一九五八年建立六百个小型厂矿，基本做到全县水力、水电化，并且计划到一九六二年使全县工业总产值超过农副业总产值百分之一百以上，比一九五七年工业总产值增长二十六倍。

永春县地方工业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发展，是因为他们办了县的工业。他们以县农具厂为核心，以小煤窑、小铁厂、小肥料厂为骨干，去帮助乡社办工业，遍地开花。看来这就是多、快、好、省地发展县办工业和社办工业的一条好的道路。我们在全专区推广永春县的经验，全专区今年计划兴办一万个小型水力、水电站和附属的联合加工厂，提前在三年内实现全专区水力、水电化。

(编者按：本文作者是中共和福建省晋江地委第一书记)

颂 抗 旱 陈 忠 生

一座座山来一河河水，
一架架水车象龙摆尾；
一双双手儿摇水车，
一股股银水浪花飞；
一塊塊秧田似翡翠，
一张张脸儿放光辉；

一片片干田滞满了水，
一个个龙王气得鬍子吹；
一塊塊秧兒肥又壮，
一田田庄稼真正美。

(编者按：作者是湖北扫盲积极分子，
今年六十四岁)



每人七分地 也能成为余粮社、富裕社

田 荣 申

地少人多的农收社能不能成为余粮社、富裕社，这是广东省潮汕平原地区絕大多数农业合作社最突出的問題。这个問題，过去有人爭論过，有人担心过，现在潮安县陈桥农收社已經用事实回答了这个问题。

陈桥社是潮汕平原上的一个大社，全社八百零五戶，四千一百七十三人，但是他們占有的耕地面积却很少，每人平均只有七分地。轉为高級社的初期，剩余劳动力九百六十五人。于是有人担心說，高級社好是好，就是劳动力沒有出路。他們把人多当成了“包袱”。陈桥社却恰恰就是利用了人多这一个看来是坏事，而实际上是有利的因素，同时也利用了該社地处亚热带这一特点，解决了“地少人多”的矛盾，把生产大大地推进了一步。解决的方法是普遍地实行合理的輪种、复种、間种、挤作等耕作制度，做到了“地无休息，經年常綠”、“寸土不空，片刻不停”。全社耕地只有三千一百零七亩，但他們在一九五七年，由于提高复种指数，全年实际种植为一万零九百八十亩次，利用率达到了百分之三百五十以上。再加上他們多种經營、开发荒地，一九五七年全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社員每人平均純收入为一百零八元，超过了当地上中农入社前收入（一百零五元五角）的水平。一九五五年該社缺粮六十二万斤，一九五六年缺粮二十四万斤，一九五七年缺粮六万斤，到今年，不但可以自給，而且可以出售一百万斤，这一計劃今年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所以，它不仅成为富裕社，而且成为余粮社。

陈桥社的农民在过去就有充分利用土地的习惯和經驗，但在个体经济的条件下，是很难全面推广和尽量發揮的。只有在組織起来以后，才能真正做到“寸地不荒，四季常青”。他們的办法主要有如下几項：

（一）合理輪耕換种复种，实行全面冬种。这样做可以使各項作物充分地吸收土壤中的各种肥分。輪耕換种的办法是在四年內把水稻、芋头、甘蔗等作物循环輪种一次，使各种水旱作物的种植有机地配合起来，不但增加了生产，而且改良了土壤。陈桥社的經驗，一般輪种次序为第一年春种为早稻，第二年为早稻或黃麻，第三年为芋头，第四



年为甘蔗或早稻。陈桥社的经验证明，在轮种情况下的水稻田，比年年连种水稻的田，每亩增产一百五十斤左右。复种、冬种也是在轮种制度下推行的。该社由于采取轮耕轮种制度，再加上各方面的措施，一九五七年水稻亩产量为一千二百三十一斤（本来应为一千四百斤左右，因有四百多亩瘦田亩产五百多斤拉平了），一九五八年要达到一千七百斤。

（二）实行间种。这是充分利用人多，更限度发挥土地潜力的有效措施。可以进行间种的有四种作物地：①芋头地；②番薯地；③甘蔗地；④蔬菜地。以芋头地来说明，从“小雪”种下芋头开始，到来年“立春”种第二年度作物止，可以在芋头地的畦边先后种植大蒜、洋葱、黄瓜、冬瓜、芥菜等作物。这种间种方法，使得一块土地在一年之内可以有七种作物的收获。这些作物的产值每亩可收入六百八十二元，扣除成本还可以有纯收入五百四十元。

（三）实行接作、挤作。“接作”就是实行不同歇的耕作。如早稻收割后，马上种番薯或空心菜，空心菜、番薯收获后再种晚稻，晚稻收获后又紧接着种冬小麦，这就可以做到一年四熟。“挤作”就是在前一种作物生长后期实行寄苗挤植。如在大蒜地里挤植茄苗，拔蒜后茄苗已吐绿，蒜畦一下子就变成茄畦。又如晚稻将收割前挤植小麦地瓜。

陈桥社在推行了这一系列先进耕作制度后，不仅发展了经济作物，增加了收入，更重要的是几年来都在不断地提高复种指数的情况下，扩大了以水稻为主的粮食作物耕作面积。在这一地区，解放前，几乎全部种经济作物；转高级社前，该社经济作物面积占耕地面积百分之六十左右；到一九五七年，由于提高了复种指数，水稻面积增至百分之六十，而经济作物面积的绝对数并未减少，但所占的比例却降为百分之四十了。今年水稻面积已增至百分之七十，计划双季稻亩产一千七百斤，这就使得多少年来都是缺粮的陈桥，变成余粮的陈桥了。

陈桥社在推行了这一系列先进耕作制度后，不仅仅在农业上增产增收，而且大大地推动了社里的工业、饲养业和多种经营的发展。只是一九五七年一年，由于农作物的多样化，大量收获的各种菜类次品和薯藤、薯叶用来做养猪饲料的共达七十多万斤，除了喂养全社一千五百多头猪以外，还有剩余，因此他们今年把养猪计划扩大到一万四千头。社里的酿酒厂和菜类腌制厂，就是以自产的作物为原料，一九五六、一九五七两年来，只腌制这一项工业，每年都有一万元以上的收入。

陈桥社因为抓住解决“地少人多”这一关键性问题，把人和地的潜在力量发挥起来，结果不但社员个人可以增加收入（他们今年计划社员平均每人收入为一百二十元，比去年增加百分之十七），而且可以大大地增加社的公共积累。他们到一九五七年已积累了十四



萬元，預備在今後三年內，使社的公共積累達到一百萬元。

陳橋社的事實有力地打擊了那種右傾保守的論調。認為“土地越種越瘦”，“地力有一定限度”，都是完全沒有根據的。陳橋社的事實證明了土地是越種越肥了，它證明了地力是沒有限度的。陳橋社的土地越種越肥，有每年增產的數字可以說明，這是有科學根據的。譬如，由於生產的青飼料多了，養豬多了，這就會有更多的肥料，反過來使土地更肥；因為一年種四季，還有間種，把這些作物的莖、葉，放回田里，也大大增加了土地的肥分；輪種間種本身就包含了改良土壤的作用，再加上為了使作物更好生長，人工地去改良土壤，這就更使土地越種越肥。陳橋社一九五七年土地利用率高了兩倍半以上。今年他們預備在芋頭地上再加復種生薑，在早稻田中擠植番薯、綠肥、黃瓜，使土地利用率高到百分之四百、百分之四百四十，這是向那些有右傾保守觀點的同志們的挑戰。我們相信，把土地利用率高到百分之六百、百分之七百，並不是遙遠的事。

陳橋社的事實還可以證明：七分地不但可以養活一個人，而且可以綽綽有餘。一九五七年該社在輪種制度、間種問題上，還未做到充分發揮土地利用率高，所以要七分多地才可以養活一個人。但以一部分比較充分發揮潛力的土地產量為準，每畝平均產糧一千二百至一千三百斤，加上種植的經濟作物收入為二百多元（七十萬斤青飼料養豬一千五百頭，約七萬五千元的收入，不計在內），那麼，一個人如果有五分地，每年就可以有六百斤糧食和其他經濟作物共一百多元的收入。這就是說，五分地就可以養活一個人了。這只是一九五七年的賬，一九五八年計劃實現後，有四分地就差不了。我們提出過兩年後三分地就可以養活一個人，完全不是幻想。這對於那些一提養活一個人就要多少多少土地的同志又是一個有力的駁斥。

通過陳橋社的事實，使我們更深刻地體會到的，就是劉少奇同志在“八大”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中所提到的“只看到人是消費者，人多消費要多，而不首先看到人是生產者，人多就有可能生產得更多，積累得更多”的觀點是多麼錯誤，多麼有害。陳橋社開始時，天天為人多地少發愁，現在天天吵勞動力不夠。事實證明了，就是因為他們人多，所以才能把土地利用率高在今年提高到百分之四百四十，才想出辦法使五分地就能養活一個人，才能使社的公共積累在三年內達到一百萬元。因此，只要把人力充分發揮起來，生產大大發展了，消費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光是喊“人口過剩”，“人口多，土地少有困難”，是完全錯誤的。

（編者按：本文作者是中共廣東省潮安縣委第一書記）



农具大革新，生产大跃进

师道鐸

陕西省大荔县和全国各地一样，现在正处在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高潮中。这个高潮，表现为蓬勃发展的兴修水利、积肥等运动，也表现为最近形成的风起云涌的群众性的改革农具运动。

在土地改革运动之后，就开始有了改革农具的事例；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这种事例逐渐增多。但是过去我们在当地工作的干部有单纯依靠国家、等待拖拉机的思想，对于农民群众创造、发明、改良农具，重视不够。在去年秋冬兴修水利运动中，群众又创造了不少工具，保证了全县三十八万亩麦田按时下种，使我们对改良农具的认识进一步提高了。后来听到毛泽东同志关于改革农具运动的指示，我们意识到实现农业机械化，要从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走群众已经开始走的道路，即：从改良现有农具，逐步过渡到机械化的道路。县委研究了改良农具的问题，向群众提出“苦战一年，普遍地实现土机械化”的口号（“土机械化”是指使用改良的畜力机械、手工具机械、自然动力机械等），迅速地形成了群众性的运动。除了各个农业社的木工组、铁工组和改良农具的能手积极行动起来以外，乡、社干部，复员军人，回

乡学生，青年老年，男的女的都参加到改良农具的行列中来了。荔湖一社五十多岁的张川娃，过去对改良农具的积极分子，大加讽刺嘲笑，现在也参加了施灰器的研究发明。婆合乡七天就创造和仿制十二种工具，杨村、苏村乡提出“七一”以前要实现“土机械化”。目前总的情况是：天天有发明，乡乡有创造，社社有改良，样样活路有新工具。据不完全统计，除了正在试制的小麦收割机、“土汽车”、“土火车”、人摇木制双轮双铧犁等以外，已经试验成功的改良农具，由三月下旬的五十四种，到四月下旬增加到二百二十一种，推广了三万四千六百件。其中有汲水灌溉、耕作、运输、农副产品加工等方面的工具。在耕作方面，从整地到收获都有了新农具。这些农具大部分是木制的，制造简单，使用方便，用钱不多，出活快，易为群众接受。

改良农具的普遍推广，大大减轻了农民笨重的体力劳动，节省出大量的劳动力。比如，占全县百分之八十的水地，除过渠灌区以外，采用各种水车以后就节省了六十万个劳动日。全县一年施肥六十亿斤，需要一百万个工，现在最多用四十万



个工就行了。全县使用各种新工具所节省的劳动日最少在三百五十八万以上，解决了生产大跃进中所缺劳力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把现有的改良农具推广以后，还可以大量增加粮棉产量。荔湖一社一九五六年创造的木制六行条播机播种的五千五百亩小麦，亩产五百斤，比旧条播机的每亩增产一百五十斤。如果全县平均以亩产增加五十斤计算，便可增产二千七百万斤。使用木制棉花播种机，每亩可增产十斤，全县十七万亩棉田可增产棉花一万七千担。

改良农具是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掌握了自己命运的社会主义的新农民，迫切要求多快好省地发展农业生产。但是，小生产者使用的农具是同合作化以后的大规模生产的要求不相适应的，同农业生产大跃进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群众中的改革农具活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但要多快好省地改良农具，迅速地取得成效，就必须形成广泛的群众运动。

首先，要打破神秘观点，积极支持群众的创造。改良农具都是普通农民发明创造的，群众中的“活鲁班”、“赛诸葛亮”很多，他们无穷无尽的智慧和才能，在新社会得到了充分发挥的广阔天地，他们对自己的发明创造活动，再也不耽心“成功了没用处，失败了要倾家荡产”。但是，他们往往在创造发明活动中遭到另外一种冷遇和压力。有些人嘲笑他们：“嘿！斗大的字不认一石，还想出什么怪咧，有学问的人那么多，也没见想出什么！”笨手笨足也

想改良什么，能改的话，人家工厂早改了！”荔湖一社创造的花生脱皮机和锄草机，第一次设计没有成功，一些人便说：“旁人把太阳从东山背到西山，喝上凉水变成汗水，劳动生产；他们吃一阵，躺一阵，糟蹋木料哩！”在这种情况下，改良农具的积极分子也往往存在着“三怕”：“怕受讽刺打击”、“怕丢人”、“怕无用了要赔工”。一些试图改革农具的人，常常躲在没有人的地方，背着人研究，甚至对父母子女和老婆也是闭口不言。因此，打破轻视劳动人民的创造才能的思想和对技术的神秘观点，是发挥群众创造性的头一关。除采用种种办法加强群众教育外，更重要的是要以实际行动支持群众的发明创造。几年来我们每遇到一件新农具的出现，都由县乡党政负责同志亲往访问、鼓励，指定专人进行研究鉴定，或是组织参观，积极支持推广，并将改良农具列为增产评比和总结生产经验的一项内容。在支持群众的发明创造方面，经常与群众有直接联系的多级干部态度如何，关系很大。乡级干部必须依靠农业社，对发明创造者应当随时帮助，排除困难，给以必要的照顾和便利。一件农具是好是坏，能否大量推广，也要依靠群众去鉴定，凡是经过群众鉴定，认为可以推广的就应去推广。过去我们在这方面认识不明确，清规戒律太多，群众创造的一些新农具，组织有关技术人员或送到有关部门鉴定时，不是被認為“不合力学原理”，就是石沉大海，一两年得不到答



案。結果傷害了群眾的積極性，使改良農具不能迅速推廣。

其次，先進人物的創造發明活動，必須與廣大群眾的經驗相結合。那些先進人物的發明創造，要用廣大群眾的經驗去補充和發展。荔潮一社在研究割草機時，經過群眾討論，提出了十五條建議，使割草機迅速出世。組織農具展覽、參觀和召開現場會議時，發動群眾討論，提合理化建議，這是依靠集體智慧，求得初出世的改良農具更加完善的一種好形式。丰樂園一社支部書記兰均瑞同志創造了風力水車，群眾參觀時提出“有風不能停，無風不能動”的缺點；他和一些同志經過一晝夜的研究，改為風力腳踏兩能水車，就成為“有風也能停，無風也能動”的水車了。最近省委在大荔縣舉辦的改良農具現場會議，當場提出的四十八條合理化建議，都被採納。改良農具通過廣大群眾的生產實踐，還會不斷地得到改良。荔潮一社制成的花生脫皮機比原來的搓皮工具提高效率六倍半，去年張家鄉合併四社在原機件上增設了風車，比原來的搓皮工具提高效率八倍，後來荔潮一社又在張家鄉合併四社改良的基礎上增設了篩子，達到全部脫皮工序都用機械操作，比原來的搓皮工具提高效率九倍半，而且降低了破子率和粉子率，提高了花生質量和出油率。群眾說：“花生脫皮機有威力，土機器里數第一，一天能搓一万六，北京城裏把名列”。

再次，緊密結合生產，大力推廣。目

前，改良農具在節省人力畜力、提高質量方面的作用，人們是深信不疑的。但在推廣方面，並不是沒有思想阻礙的。有人熱衷於創造發明，忽視了推廣；也有的人為了爭名，老想創制，不肯仿制；還有人聽到三五年內要實現農業機械化，便就心改良農具“三年兩載就得報廢”。這些都影響了現有改良農具的迅速推廣和生產的發展。我們採用了組織參觀、開現場會、算賬對比的方法，說明推廣和創造的關係；說明推廣現有改良農具和增產的關係；說明改良農具與機械化的關係，以及在農業機械化以後，改良農具也是必不可少的。事實上目前使用的某些改良農具，將來也不會無用的。例如東方紅一社創造了畦埂上播種一行麥子的三腰轆，已在灌區普遍推廣。僅此一項就等於增加土地利用面積一万三千多畝，可增產糧食二百六十六萬斤。這件農具就是機械化以後也不會失去作用。正如群眾所說：“畦梁種麥耨，身小作用大，日後機械化，增產還要它。”推廣改良農具，必須緊密結合當前生產。目前已經出現的改良農具種類很多，要使它很快地發揮成效，就要根據當時當地情況，抓住帶有普遍意義的幾種改良農具，分期分批地大量推廣。最近，我們結合麥收準備工作，正在推廣收割運輸等方面的改良農具四萬四千多件。隨著改良農具運動的發展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出現了原來的勞動定額落後於新的平均勞動定額的現象，和各工種間勞動定額不平衡的現象。



适时地、恰当地注意調整劳动定额，这是有关提高群众改良农具和發展生产的積極性的一个重要問題。我們正在研究中。

改革农具运动要与群众的技术文化学习結合起来。在改革农具的影响下，广大农民群众特别是青壮年学习文化技术的要求更加迫切了，他們写决心書，提保証条件，要限期卸掉文盲帽子，限期学会几套技术。技术研究組、技术夜校也活跃起来

了。社社都建立了技术夜校和技术研究小組。在农村中正在出现一个学习文化和科学技术的高潮。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是互相影响、互相推动的，只有把两者很好地結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把农具改革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編者按：本文作者是中共
陕西省大荔县委書記)

一个青年农民把柴油机改装成了拖拉机

全 云

李生根是山西省解虞县城关鎮繁荣农业合作社的共青团支部書記，高小學生。他在一九五三年担任了本社的柴油机手，由于工作積極，学习努力，現在被选为合作社的技术股长。他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在长期劳动锻炼中，已經成为一个熟练的柴油机手和年輕的技术革新者。

李生根改装“拖拉机”是从去年冬季开始的。在党的号召和农业生产大跃进新形势的鼓舞下，他鼓起勇气，大胆地想問題，针对合作社劳力、畜力不足的困难，决心把一部只能轧花、磨地的五馬力柴油机，改装成能干多种农活的拖拉机。

在改装这部拖拉机的过程中，李生根遇到很多困难。他以頑强的干劲和勇气，把困难克服了。没有学过机械原理，不会繪圖，他就边想边画，边画边做，边做边看，边看边修改。他为了改装这部拖拉机，下了很大的苦功，曾几十次地跑到附近拖拉机站，觀看拖拉机和汽車的构造，研究車軸安装和車輪轉动的原理。白天沒有時間，他就晚上熬夜干；社里沒有材料，他就到处找廢料；有了材料不会加工，他就找青年鉄匠李德寬、青年木匠郭貞祥等合作起来干。这样，他們苦干苦鑽九十多天，沒有花費社里一文錢，終於在今年

三月下旬把这部拖拉机改装成功。过去是一部只能干两种活的机器，現在成为一部能耕作、灌溉、运输、轧花、磨面、掘壕、鋤草等多种农活的小型拖拉机了。它在一个鐘头內能够做的工作是：耕地二亩，或耙（耨）地二十亩，或掘壕一万斤，或挖地二亩，或鋤草一千二百斤，或轧花一百五十斤，或磨面二百斤；送肥料每小时能跑三十里，每次載重两千斤以上。所以，社員称它为“万能拖拉机”。

李生根等改装拖拉机成功的消息，惊动了邻近合作社男女社員和全县城乡群众，特别是对男女青年們鼓动很大。当李生根駕駛着自己亲手改装的“万能拖拉机”，奔驰在村庄、道路和田野上的时候，受到了前来參觀、訪問的群众和乡亲们热烈的祝賀和贊揚。許多合作社和工厂派人前去学习，准备推广。

解虞县委十分重视这一改革，給予很大支持，并決定将全县二百八十八部柴油机都改装成小型拖拉机。如实现这一规划，则全县合作社在不太长的時間里，不用花費多少錢，就可以增加一千四百多馬力的經過改装的小型耕作、运输机械了。



找資源，挖潛力， 做好农村的采購工作

楊一辰

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經過整風运动，掀起了以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設高潮，商业工作也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而正在跃进着。商业部門的广大职工在各級党委领导之下，展开了大購大銷、支持生产、与各方协作、改善服务态度、精简机构和提高劳动效率的运动；北京市已發展到对商业网作全面的合理的調整；許多城市工矿区也正在协同有关部門積極安排副食品的生产基地。这一切都将大进一步地改变商业工作的面貌。但是，目前在商业工作人員中，对于怎样支持和推动生产的问题，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認識和作法。

一种人認為，商业工作就是“做买卖”，只要作到生产什么收購什么，就等于支持了生产，至于生产则是生产部門的事，商业部門可以完全不管。因此，他們便只考虑买和卖，不研究生产情况，不关心和协助国家在各方面的組織生产的工作，而是消极被动，等貨上門，等客上門。

另一种人認為，为了全力支持生产，不仅要生产什么收購什么，而且要積極主动地协助生产部門进行规划和組織生产，千方百计地寻找資源，挖掘潛力，做到由少到多，由无到有，由无用变有用，由废品变财富。

我們是反对前者，贊成后者的。因为生产是商业發展的基础，只有發展生产，才能扩大商品流通，稳定市場，保証供应。商业工作人員如果只注意商品流通問題，不注意生产問題，肯定是不能做好商业工作的。

我在这篇文章里面准备說的是在农村的采購工作中如何找資源、挖潛力的問題。

我國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無論植物、动物和矿物的資源，都有很大的潛力，农村中也有很多可以利用的废品，“遍地都是宝，只要人去找”。重要的是，商业部門要依靠群众，与生产部門密切协作，研究和說明資源的用途，推广先进經驗，进行技术指导，制定合理价格，便利群众出售。

現在举几个例子說明如下：



首先是利用野生植物。我国土地面积大约三分之二是山区和半山区。滿山遍野的野生植物是極丰富的资源，这些东西“不用是草，用是宝。”经过几年来經營証明，野生植物的皮、根、茎、叶大都含有纖維。纖維长、拉力强的可制人造棉、人造麻或彈絮紡紗，纖維短、拉力弱的可供造紙原料。四川三台县利用野生植物制造纖維紡紗織布已經成功，这一經驗正在推广。粗略估計，野生纖維全国年产量約六千万担，如果以一半用作人造棉，以平均出棉率百分之五十計算，即可年产生人造棉一千五百万担。如果把这些人造棉全部用于紡織，就可以織布一亿五千多万匹，全国每人平均有二十八尺多。野生植物的籽实，不含淀粉就含脂肪，不能釀酒便能榨油，有的还可制成高貴的香料。全国可以制淀粉和釀酒原料的橡子年产量估計有八十亿斤，以二分之一釀酒就可以出白酒四十多万吨，相当于一千万亩玉米的出酒数量。目前已發現的各种野生植物油料有四百多种，经过化驗和試驗，含油量在百分之十五到六十。这些油有的可以作工业原料，有的可以食用。其中如产于南方各省的山蒼子，所榨出来的油，試銷国外，声誉良好。由此可见，野生植物的大量采集，既可以增加工业原料和社会财富，同时也可以增加农业社和社員的收入，可以由此取得扩大农业生产建設所需要的資金。按照三台县的初步計算，单就收集野生植物做人造棉、做酒、做淀粉，一年收入就是一千多万元，两年就可以筹集农业机械化的資金。有些地方提出了“向山区要酒、要糖、要油、要粉；向树林要棉、要紙、要胶、要麻”的口号。这是一个很好的口号，我們認為全国各地都可以普遍实行。

野生植物的利用，促进了紡織、造紙、榨油、釀酒工业的發展。野生植物的加工，需要大量烧碱、碳酸鈉、漂白粉、中性油、肥皂、硫酸，这也就給这些工业产品开辟了广闊的市場，从而促进化学工业和其他地方工业的發展。

其次是利用动物资源。广泛地采用青粗飼料养猪，給养猪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闊的前途，去年年底全国养猪一亿三千万头，今年计划要养到二亿六千万头。今年养猪发展的特点是扩大了集体飼养，但是集体养猪在技术上、資金上还有若干困难，商业部門应当通过預購和协同农业部門开展防疫工作等办法，来协助合作社解决生产上的一些困难。生猪大發展不仅可以增加肉食供应，改善人民生活，而且能够增加肥料，促进粮食增产，增加猪肉出口，增加地方工业的資金，加速我国工业建設。根据概算，大約六万头猪的价值就可以建立一座年产八千吨的化肥厂。商业部門可以通过收購生猪和預售化肥的办法帮助建立化肥厂。再如利用耕牛挤奶，也有很大的潜力。目前全国有六千万头牛，当年可以生产牛犢的母牛約在一千万头以上，如果普遍推行耕牛适当挤奶，一般的說有三分之一的奶和三分之一的脫脂奶（提出黃油）喂小牛，就可以滿足小牛的需要，还有三



分之一的奶可作奶粉。这样在不影响小牛正常發育的情况下，每年可以生产十多吨黄油和四、五十万吨奶粉，既可满足国内市场需要，也可增加出口商品。这对农业社社員來說，約可增加收入七、八亿元；社員增加收入以后，又能刺激繁殖小牛的積極性，有利于耕牛的大發展。同时，耕牛挤奶的开展，还可以推动奶制品工业的發展。牲畜身上没有一点可以遗弃的东西，肉可食，皮制革，骨作肥，毛紡織。例如一个猪的副产品如果充分利用，价值相当于猪肉价值的一半。

关于动物饲养方面，有些地区的商业部門已經作出較好的规划，如黑龙江尚志县章河鎮的商业部門詳細地調查了該地各种可以利用的資源，積極地組織群众进行养猪、养牛、养羊、养馬、养家禽、养虫、养蜂、养蛤蟆，并且提出了变野生为家养。根据规划，加上其他生产收入全区平均每人今年可以增加收入三十五元。全鎮二十个农业社中，有八个农业社的机械化資金可由此全部获得解决，十二个社可以解决大部分。

对于利用野生植物和动物資源的問題，現在有些人在思想上有些顧慮，还有“两怕”：一是“怕麻煩”，他們認為資源不清，收集起来費事，过去沒有做过，不懂技术，怕产品质量低，沒有銷路等等。其实只要依靠群众，資源不清可以查清，收集并不困难，不懂技术可以学习，产品质量不好可以提高，产品价格可以降低，銷路自然也可以打开。二是“怕賠錢”。問題是怎样算賬，要算大賬，算整个国民經济的賬，算长期賬，小賬服从大賬，如果把这些資源充分收集和利用起来，不仅不会賠錢，反而可以增加財富，增加积累。个别商品在开始經營的时候，可能賠点錢，但通过找窍门，想办法，努力改进工作，完全可以做到由賠錢变为賺錢。

第三是废品利用。废品是一笔很大的財富。在这方面已經有好多地方作出了范例。如河北省无极县一九五七年收購各种废品共七十四种，总值六十一万元，平均每人二元四角四分；其中破布、旧鞋袜、旧棉花三項共一百五十五万斤，重新加工以后，出熟棉九十七万斤，可織土布三十二万匹。废品經過加工以后大大提高了价值，如破鞋、烂袜底每百斤才值三元五角，加工制成各种产品以后共值一百二十元。由于进行废品的收集和加工，全县就业人数就增加了八千人。五保戶不仅生活得到了更好的保证，而且还有了零用錢。群众說：“五保戶成了十保戶”。全国各地如果都能这样做，約略估計，仅加工棉花一項就有六百万担，可增加大量人員就业。徐州市作到消灭貧民，这方面的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第四是零星矿产的开采和加工。我国地下矿藏异常丰富，大的矿山由国家开采，零星分散的小矿，可以发动农业社社員利用农闲进行开采，商业部門收購矿石就地冶炼。这就会使小型冶炼工业普遍迅速地發展起来。河北省平谷县采用这种办法炼铜，已經取



得成效。县委提出了“农闲大搞，农忙小搞，农民开采，商业收购，季节开采，常年冶炼，分散开采，就地冶炼”的办法，劲头很大，计划今年生产四千吨铜。

在最近举行的有六个省商业部门的同志参加的座谈会上，把平谷县的炼铜方法当场进行了试验。办法很简单，只用十一块土坯，几十分钟就建成一座小爐，一点鐘就可把矿石炼成铜塊。大家看了以后得到了鼓舞，信心很高，认为只要党委加强领导，按照平谷县的办法，对劳动力全面安排，上山开采，收购矿石，积极冶炼，完全有可能在今年后半年出铜三万吨。

几年来的經驗都証明，以上所述野生植物的利用、动物的饲养、废品的收购和矿藏的开采，都必须经过初步加工，才便于大量收购、运输、保存，才便于对城市工业作好供应。商业部门对这些分散的、小型的加工工业，必须积极举办，才有利于发展生产，扩大流通。

几年来的經驗又多次証明，怕商品积压而不积极主动地大买大卖，势必影响生产发展与充分供应，影响经营扩大，影响国家积累。我们的基本精神是：商品不足时，积极促进生产；一时过多，可加工保管，多方面开辟用途，或协助改制其他商品。总之，要使生产不断发展，流通不断扩大。商业上库存物资充分的时候，国家扩大生产，扩大建设，便有了有利的条件，而生产与建设的扩大又会克服库存一时过多的现象。

从以上事例中，可以充分地说明商业工作积极主动地千方百计地支持生产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在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飞跃发展时期，社会主义商业应该把这个光荣任务担负起来。商业部门应当接受各级党委的领导，各级党委也应当加强对商业部门的领导。河北徐水、无极、广东新会等县已经取得了经验，他们派了很多的区委委员担任商店党的支部书记，大大地加强了党对商业的领导，使商业工作围绕着党的中心工作进行，这也就大大地发挥了商业的作用，促进了生产，保证了供应。

为啥云上红旗飘

朵朵白云天空飘，
朵朵云上红旗搖，
是不是天兵开了战，
为啥云上红旗飘？

望！社员星荒在山腰。
头顶蓝天手拿鎗，
驾着云雾满山跑。

“要和神仙比高低！”
喊声冲上九重霄。

硬石头上种五谷，
白云上面栽仙桃。

太阳出海大吃惊，
吓得虎狼到处逃。
明天要去闖天宫，
夺取天河洗仙桃。

(山东单县民歌)

仔细看，仔细瞧，



五台山变成聚宝山

王銘三

“台山遍地宝，
长眠不知晓，
工业大跃进，
眼笑眉开了。”

“山中宝藏丰富，
人民智慧无穷，
野生植物变家生，
功盖伏羲神农。”

这两首民歌是形容山西省五台县资源丰富，群众和干部大闹五台山的情景。在全国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形势下，他们要把许多野生植物加工利用，来发展地方工业，并经过保护和培植，使野生变为家生，使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们要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把五台山变成“聚宝山”，为开发山区多种经济，打开广阔的道路。

五台县全境，东跨台山，西达泉岩，南襟沁水，北枕棉岭，绵延起伏，共有大小山五十二座；总面积四百六十七万多亩，百分之七十三是山，可耕地只有六十四万八千多亩。这里居住着二十一万多人。解放前人们生活很苦，据县志载：“台民多依山阶处，艰于生业，惟事耕凿；然平時寬裕，号称沃壤者十不得一，山地皆碗碟，

一亩获粟数斗。”在农民口中，也流传着这些说法：“走进五台山，两眼不见川。从春忙到夏，汗珠滴地下，费去千辛苦，一粒没收下；扶老携幼肩挑担，外出逃生是正千。”

解放以后，五台山人民的生活随着农林牧副业的发展，已有了相当的改善，山区各项建设事业也获得了不小的成绩。但由于很多人的思想还没有彻底解放，没有充分地看到山区经济的巨大潜力，没有大力领导群众发展多种经济，因而，经济发展缓慢，除少数产花椒、梨果等经济作物区外，一般山区都赶不上平川。

一九五六年遭了一场大涝灾，冲刷了许多土地房屋，曾使人们对治理山区发生了动摇，产生了移居的想法。当时党和国家大力救济，发放了三十五万多元的救济粮款。为了扶助群众生产，县委还责成供销社大力帮助群众搞副业。可是群众只能搞些山条、野草、白土子，价值不大，销路不广，供销社很赔本。“这不是个长事呀！”五台县供销社主任张通明想，“但是处在这个穷山区，又有什么办法呢？”

在党的教育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鼓舞下，张通明想通了一个道理，树立了一



个坚强的信念：人必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靠山吃山、吃山养山，通过供销社的业务来扶植生产，就一定可以改变五台山的面貌。“对，一定要为五台山的人民找一条出路！”

去年夏季的一天，张通明和县供销社干部阎希康到陈家庄，路过翟家沟，爬了一座山，就山梁坐下来休息。张通明看到东山坡上红扑扑的一片酸刺子（醋柳）被太阳照射的闪闪发光。他说：“希康，你看这红扑扑的一坡多好看。”阎希康说：“五台山，好东西没有，这种玩艺儿到处都有；又刺人，又没用，可是偏它土坡上也长，石头缝里也生，不论天旱雨涝，年年是繁扑拉拉地。”

阎希康对酸刺子的议论，张通明在小时候就懂得；可是现在听起来，却有种新的感觉。他两眼盯着酸刺子呆呆地出神：“这东西，生命力很强，要是把它嫁接成果子或想办法利用起来，那对五台山的人民……”从此，这种想法，便时刻在张通明的脑子里盘旋。

“听人说有粉有糖的东西便能酿酒；糖是甜的，吃多了发酸，酸刺子也是酸的，是不是也能酿酒？”张通明这样想。他有个特点，是敢想敢做，想到就做，成不成总得试试。他马上让城关、茹村两个基层社试验。

第一次不成功，说什么话的人也有：“没榆子还想上天哩！”“真是劳民伤财。”“要是花他们家的钱，也不那末乱闹腾，供

销社养着一伙败家子！”

茹村供销社副主任王贵全可就没兴致了，找到张通明说：“花了钱不出酒，怎么办呀？”张通明问：“花了多少钱？”王贵全说：“十八元。”“咱花一百八十元，搞它十次。”张通明心里打着个算盘：既然熬不出酒来，还能出饲料，赔不了老本儿；要试验成功，就给五台山人带来很大的利益。

一连四次不成功。第五次，人们在供销社门口嗅见酒味气了，有的人还跑进去尝了尝，说法也变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啥事情也不难干；供销社用酸刺子烧出酒来了。”

王贵全也向张通明说：“这一下既满足了市场货源，又增加了国家积累，真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情。”张通明说：“是一举六得的好事情。除了你说的以外，还有把没用的东西变得有用，给五台山人找到一项生活来源；节省了国家粮食；解决了猪饲料不足；最主要的是在咱们思想上打开了一个缺口。”

经过试验成功，大家思想初步获得解放。张通明在全县基层社主任会议上发动大家上山勘察，他说：“要想开展供销社业务，必须改变山区贫困面貌；要让五台山人富裕，不从山上打主意不行。”当时就组织了三十八个干部，分头到各山勘察。开始没经验，遇牛工便问讯，见羊工就打听，碰到草就刨，摘上杆便嚼。有淀粉没邪味的，试验酿酒，做代食品；又苦又涩的，试验榨油，或当猪饲料。遇到山条、



树皮折断看一看，有，有絲的便想办法抽纖維。他們就是这样，从五月到十月，受尽了日晒雨淋，飽尝了千辛万苦，从南面魚洞山，經东面长城岭，过北面台頂山，到西面峨岭上，走了三千五百多里山路，初步摸清了五台山上可以利用的野生的油酒原料，代食品，代飼料，野生纖維，各种山条、藥材等五百余种。并發現許多很有价值、而当地人民根本不知道的东西。如石槽沟群众把能出口的藥材藥芩認為是烂草，經过他們采集，群众知道后說：“宝贝就在脚底下，多少年来不晓得”。

山中的宝如何变成人們的需妥品？这是落在五台县供銷社同志們头上的一个新难题。出酒的釀酒，含油的榨油，許多藥材也不难出手；但是一些价值不大，銷路不广的东西怎么办？开始，他們只是写信或派人与各地联系推銷，效果不大。后来，他們想了个办法，把这些东西加工成适用的商品。当地的知母产量大，当藥材没有銷路，便加工成酒；山条、小木材，組織农业社編制成藤头、囊筐、地磨片，很快便推銷出去了。这样，真正体现了商业为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的精神。由于树立了这种正确的观点，所以在碰到困难問題时就能依靠群众，采取群众路綫的办法来克服困難。有一次，县社与内蒙一些地区，签定了六千九百多张地磨片的交易合同，但群众正在大鬧水利建設，勞力紧张，加工不出来。供銷社就召集加工地磨片的农业社社員討論，社員們願黑夜加工，白天不誤水利建

設，問題就解决了。去年后半半年，供銷社发动群众采集、加工九种野生植物，价值达三十六万多元。其中光組織五保戶編制加工費就有二万四千多元。

由于深入发动群众，充分地利用山区资源，现在县供銷社自办的和与乡、社联合兴办的加工厂已有七十多个。带动了五台县地方工业的大發展。

从开发山区的过程中，人們深刻地認識到五台山遍地是宝。要想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就必须吃山养山，不能坐吃山空；要充分利用山区野生资源，必須大力发展地方工业，从而使商业和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紧密地联结起来。但在实际工作中仍有不少困难。直到中央提出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針，全国工农业大跃进形势出現之后，思想才海闊天空地解放出来。

如何吃山养山，是他們辯論的重要問題之一。有人提議在野生植物上嫁接蜜桃家杏，有人提議培植有价值的野生植物，有人甚至提出把野生孢子、野山羊、野鷄，也飼养起来变为家养。最后他們提出了一个具体规划：与有关部門协作，发动群众采取分山划片，社社社收的办法，培植有价值的野生植物，使之永远取之不尽。今年在桑泉山、月桂山、大草坪、东冶、茹村等荒山沟崖上，大量播种产量大、出油率高的野生毛兰旦等；五年內，在大北山、四大天王山等地，每年培植价值大、可以出口的山黃、秦艽、半夏、冬花等野生貴



重藥材一萬畝；并從河南移植紅花，三年以後長成，每年可輪收三百萬斤。

為了充分利用野生植物，確定大力興辦地方工業。五台全县今年要辦一千四百多個小工廠，現已開工的有一百零四個。凡能加工的野生植物，全部加工，能釀酒的不做醋，能制纖維的不燒柴。單原來計劃的二百零九座小型綜合加工廠，就可加工產品五百餘種，總值七百零一萬一千八百五十元。真正達到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要求。

此外，要利用五台山一帶二十多萬畝的草坡，建立五個牧場，繁殖優良牲畜和細毛羊。結合水利和水土保持工作，在

適宜的山坡上，大量栽培梨果、花椒樹；河沿上壓酸刺子；地埂上壓桑條，發展養蠶。在全縣興修的二百五十個水庫內養魚苗一百萬尾。

為了使五台山變寶山，五台縣委書記已親自挂帥，和供銷社主任張通明以及工業、農業、手工業等部門密切協作，組織了六十六個幹部深入山區，大鬧五台山。

最近地委已在五台召開過有各縣供銷社主任及工業部門幹部參加的現場會議，學習和推廣五台的經驗。口號是：“劈山變寶山，到處出現活神農”。

（編者按：本文作者是中共山西省忻州地委第一書記）

一、有些讀者來信，問“一勞二白”怎樣解釋。據我們了解，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就是：第一，貧勞；第二，空白。空白的意思指文化落後而言。

二、本期范文瀾同志的“破除迷信”的文章里說到南郭先生的故事。這個故事出於韓非子的書里。戰國時，齊宣王愛听吹竽，而且總要三百個人的樂隊一齊吹。南郭先生本來不會吹竽，混在樂隊里面，也裝腔作勢地吹。齊宣王死後，齊湣王接位，他要吹竽的人一個個地吹給他听，南郭先生混不過去，只好偷偷逃走。從此以後，人們就把這樣的人叫做“濫竽充數”。

——編者

